

編 者 的 話

今天，在我們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工人、貧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都成了国家的主人，并且正在意气风发地为把我国建成偉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进行忘我的劳动。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毛主席教导我們：“千万不要忘記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毛主席的偉大号召下，在城、乡开展了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我們东北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广大劳动人民回忆过去，对比今天，写出了許多家史、村史、社史、工厂史，以及其他各种专题史。这些史料揭露了旧社会統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殘酷剥削和压迫，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在解放后当家做主和过着美滿幸福的生活。这些史料，是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它能够使我們（特別

是青年一代)了解什么是旧社会,什么是剝削和压迫,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它能够使我们不忘过去苦,憎恨旧社会,从而更加热爱今天,热爱党、热爱毛主席。这些史料同时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继承并发扬老一辈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派,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艰苦奋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更好地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们从东北地区的“四史”材料中选出一部分,编成《东北地区四史丛书》,陆续出版。由于编辑水平所限,加上这是一项新的工作,缺点和错误一定难免。我们热情地希望读者提出批评,以便把这套丛书编得好些。

編 者

1965年2月

目 录

編者的話

矿工的仇恨..... 1

——記日伪統治时期西安煤矿矿工的悲惨遭遇

苦难的二十一年..... 13

我的童年..... 23

永不忘的仇恨..... 34

再生記..... 43

矿山血獄..... 52

痛打矿警队..... 63

一張工票訴深仇..... 69

矿工的仇恨

——记日伪统治时期西安煤矿矿工的悲惨遭遇

吉林省辽源矿务局“四史”编写小组

在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矿务局太信矿东二井的西南，有个矿工墓地，以前人们叫它“方家坟”，它是日伪统治时期在辽源煤矿遗留下来的许多矿工墓地之一，是日伪统治时期西安（今辽源）煤矿最大的柜头——“方家柜”的万人坑。虽然名为“方家坟”，但是，里面埋的并不是什么方家人，而是被日本鬼子、资本家、封建把头残害的矿工。当时有首民谣说：

方家坟，方家坟，
没埋一个方家人；
鬼子把头开坑口，
害尽穷苦挖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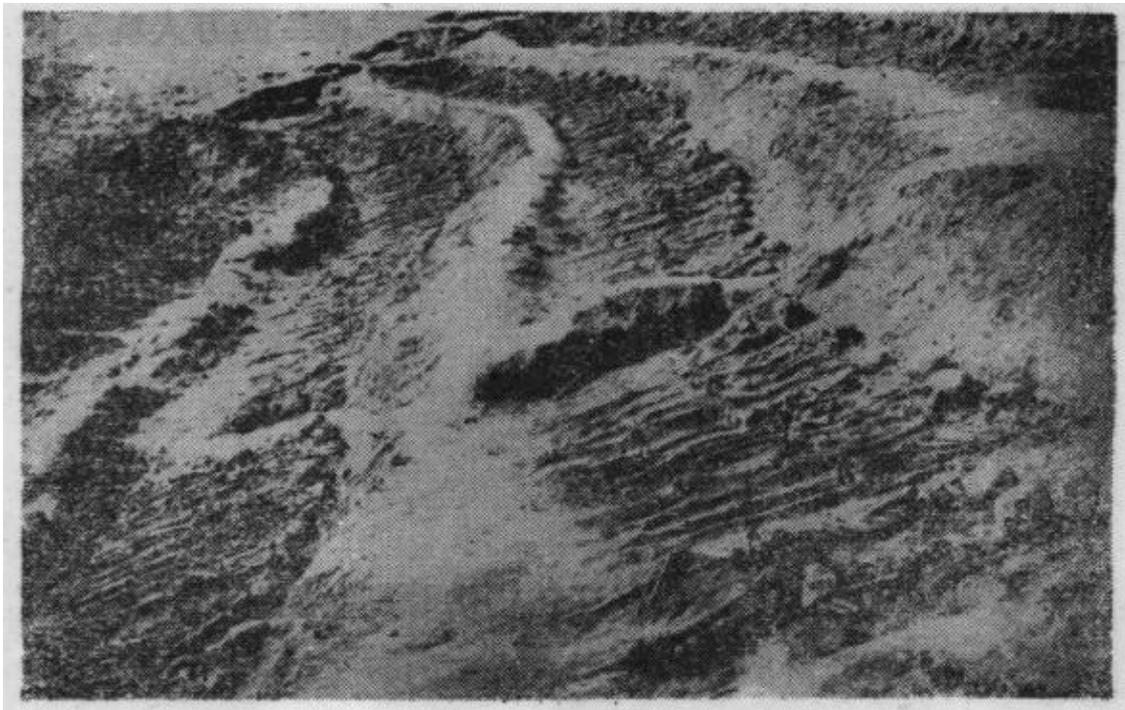
辽源市人民为了纪念在日伪统治时期，屈死在日本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把头手中的矿工，把“方家坟”

改名为“日伪统治时期辽源煤矿死难矿工墓”，并立碑撰文，让人们“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几万矿工的生命

一九六三年九月，太信矿一千三百多名职工，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来到“方家坟”凭吊和祭扫。祭扫的人们，清除浮土，掘开了这块墓地，在这里，尸骨密密麻麻，一具挨着一具，一层压着一层。人们屏住呼吸，含着眼泪，默默地看着这些被残害的阶级弟兄的遗骨。

在墓地的东南坡上，有一处大约二百多平方米的地方，竟埋着三排矿工的尸骨，共有一百七十九具。这些尸骨肩靠着肩，腿挨着腿，尸骨和尸骨之间只有很小的距离（见照片）。从这些尸骨的形状看，有的歪着头，有的蹩着腿，有



的双手和双腿被一道道铁絲捆绑着。还有的尸骨的头部、臂部、腿部殘留着深深的刀痕，有的骨盆被燒得焦黑……据一些僥幸逃出魔掌的老工人說，这些死难者不是累死的、餓死的、病死的，就是不甘心忍受苦难生活，进行反抗被打死的，或是因为逃走被抓回来給折磨死的。

在墓地的西坡，有一块方方的草地，周圍用草绳拦着。这就是当年的“炼人炉”。据老工人回忆：“方家坟”从一九四一年开始埋人，一年零八个月就把这块坟地埋滿了。从那以后，就修了这座“炼人炉”。成千上万的尸体，甚至是还没咽气的活人，被拖到这里燒成灰烬。在日伪統治的那些年月里，“炼人炉”昼夜冒着濃烟。辽源解放已經十七年了，“炼人炉”遺址上至今还有一尺多厚的骨灰和焦土。

“方家坟”究竟埋了多少死难的矿工，“方家柜”究竟吞噬了多少我們階級弟兄的生命，已經无法計算了。从我們发现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至少有几万人在这里断送了生命。

从火坑到地獄

当时的工人是怎样来到“方家柜”这个人間地獄的呢？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伪“滿洲炭矿株式会社”，派出了所謂“国外募集班”，在天津設立了招騙华北一带破产农民和失业工人的总机构——“天津北支劳动事务所”。利用封建把头大批大批地招騙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苦群众。“方家柜”的把头們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豢养的爪牙

之一。“方家柜”的一批汉奸、走狗經常到关里各地招騙工人。他們到处宣傳：“到关外学手艺去！干活跟玩一样，吃大米白面，穿的好，掙錢多……”于是，大批破产农民和失业工人就受騙了。他們被装进了“悶罐車”。車門一鎖，吃、喝、拉、撒、睡都不許出来。每天給两个掺了豆腐渣的窩窩头，拿都拿不上手来，得捧着吃。渴了，連口干淨水也喝不上。下了火車往矿山去的时候，也由把头、外勤提着棍棒押着走；有时还把工人装在带帆布篷的汽車里故意拉着繞大弯子，不让工人認識道儿，以防逃跑。工人們就这样背井离乡，被押到了“方家柜”。实指望逃出火坑，在“关东”找一条生路，哪曾想，摆在他們面前的，却是一座人間地獄！

人們进了“方家柜”，就象鳥关进了籠子。“方家柜”的四周圍着两道铁絲网，中間夾着一道高压电网，最里面又是一道一丈多高的土墙。从各地招来的矿工和他們的家屬，全部关在这个圈子里。这个大圈四周有七道卡子門，每个門都有两个提着鎬把的外勤把守着，不許人們随便出入。矿工們上下班都由外勤把头押送。这七道卡子門，只有一道是为矿工开的，而这个門只出不进。这就是“方家柜”往“方家坟”运送死难矿工尸体的大門。

悲惨的矿工生活

每天早晨三点来钟，炕长就吼叫着逼工人上班。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矿工們，就得慌忙地揭开身上的破棉被、麻袋

片，有气无力地爬下炕来。动作稍慢了一点，炕长的鎬把就会打在他們的身上。

一桶发了霉的半生不熟的高粱米飯，往地中間一擲，有碗的就盛上一碗，沒碗的就用柳罐斗盛，用手一把一把抓着吃。吃完飯就被外勤逼着去挖煤。矿工們赤着脚，在滿是冰雪的道路上吃力地移动着，他們要在灯房子領了矿灯，到井口才能穿上昨天下班时脫下来的破胶鞋。他們身上披的是破烂衣片，沒有衣服的就破被子挖个窟窿，套在脖子上，拦腰一系，勉强遮体，在刺骨的寒风中抖成一团。就在这种情况下，矿工們开始了一天的沉重劳动。

井下，昏暗的灯光照着低矮的巷道。遍地积水浸泡着腐朽了的矿柱，散发着发霉的气息。井下巷道毫无規則，生产秩序非常混乱。通风不好，氧气稀薄，掌子面有时憋得透不过气来。許多人晕过去就再也沒有醒过来。采煤掌子面根本沒有安全措施，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落下石头把人砸死。在这种生命毫无保障的条件下，工人們每天要被拿着鐮头棍的把头逼着干十二个、十三个、甚至十四个小时的活……

夜晚，該是平靜的时刻了吧，而矿工連睡觉也不得自由。屋里有炕长監視，屋外有外勤、矿警巡邏。睡觉时还必须朝着一个方向：后一个人的面，朝着前一个人的背，誰也不許看別人一眼，不許吭一声。有一夜，矿工張景富睡得迷迷糊糊，不知不觉翻了个身，和后面的人对了面，他們立刻被監視的炕长拖到柜房，每人打了十鎬把。又一次，童工譚

金章冻得实在忍受不住，悄悄向身后的另一个童工说了声“冷”，炕长听见了，就把他们俩拖下炕来，逼着他们面对面跪在地上打“协和嘴巴子”（即互打嘴巴）。同是苦难的兄弟，誰能忍心下手呢！不打，炕长就亲自动手。矿工夜间大小便也是一道难关，不论刮风下雪，都得光着身子出去。有一位老矿工小便时间稍长了一点，就被外勤一脚踢进了粪坑……

这就是矿工们每天的悲惨生活。

殘暴的压榨

解放前的殖民地煤矿是用矿工的性命来换取煤炭的。在“方家柜”，矿工的生命是毫无保障的。井下被車轧死的，石头砸死的，瓦斯烧死的，因为缺氧憋死的……天天都有。井口設有停尸房，“方家柜”还专门雇了两个拉尸的。几乎每天都要从井下拖上几具死难矿工的尸体，凑够一車就拉到“方家坟”去。

一九四一年五月五日，坑内发生瓦斯爆炸，四百多工人被烧死在里边。有二十多人侥幸生存，他们挣扎着从主井絞車道往井上爬，好不容易才爬到井口，哪知道，日伪统治者为了“保护设备”，早用紅磚把井口封閉了。直到解放以后，恢复生产时，工人们打开井口的封閉墙才发现：这二十多个阶级兄弟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封閉墙边。有的双手掘进地里很深很深，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还有一次，眼看采煤掌子就要冒頂了，把头們还硬逼着刘向、刘瑞等五个工人进掌子。他們剛进去，只听“轰”的一声，頂子塌下来了，五个人活活地被埋在煤堆里。

那时的矿工，誰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明天。常常是下井是活人，上井就成了死尸，而被拖到“方家坟”。

“方家柜”北边有座小桥，那时，每当矿工下井，总有矿工的家屬翹首遙望，目送亲人，默祝亲人平安。但是有多少次，他們等到的却是亲人惨死的噩耗。人們含着眼泪把这座桥叫做“望魂桥”。

生病，对矿工来說，就意味着死亡。鞠永发的父亲因饥饿和过重的劳动得了重病，狠心的把头赵玉春却說：“脑袋硬不硬？硬就得挖煤去。”他父亲被逼硬挺着下井干活，結果左脚被砸伤了，不停地往外流血。炕长說有碍“卫生”，便把他扔进“病号房”。这是一間阴暗、潮湿、无人过問的大房子，工人把它称为“北六号”。“进了‘北六号’，性命就难保”哇！在这里，土炕上躺滿了瘦得皮包骨的人；呼喊声、惨叫声連成一片；橫七豎八的尸体发出刺鼻的腐臭气。鞠永发的父亲来到这里，很快地就死了。

在“方家柜”，把头、外勤可以任意殘害矿工的性命。有个姓刘的小伙子，剛到“方家柜”时，由于吃橡子面窩窩头、喝了脏水，得了泻肚病。他向外勤請假休息一天，外勤班长說：“好吧，晚上給你治病。”常言說：“毒蛇沒有不伤人的，豺狼沒有不咬人的。”这个新来的小伙子，哪里知道

外勤的用意呀！他还真地躺在炕上，痴心地等外勤来给他治病。等到晚上，外勤班长领几个外勤来了，一进大房子，就在屋地架起柴火，把一把大平板铁锹放在火上烧红了。一个外勤提着这把烧红了的铁锹，象恶狗一样扑向姓刘的小伙子，厉声喝道：“起来！给你‘治病’！”并逼着姓刘的小伙子坐上去。他说什么也不坐。几个外勤，七手八脚，把他狠狠按住，小伙子尽力挣扎，无奈他身患重病，四肢无力，终于被几个外勤架着按到红铁锹上了！惨叫声、狂笑声响成一片。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就这样被“方家柜”活活地残害了！

最狠毒的是日本鬼子和“方家柜”还养了一些狼狗专门残害矿工。狼狗圈就设在“方家柜”西北“劳务系”的后边。当时，工人连高粱米饭、窝窝头都吃不饱，可是鬼子却用大米饭炒猪肉一天喂狼狗三遍。还特意雇了一个人侍候狼狗。有一回，工人韩志林想要上街办事，卡子门的外勤不准他走，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电网底下钻了出去。谁知被伪“劳工协会”的狗腿子看见了，把他送到东城“警备班”。“警备班”的强盗，把老韩扔进了狼狗圈，老韩竟被狼狗吃掉了！

过去的资料载明，这里矿工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岁半。他们工作年限在一年以上的，不到全体矿工的三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矿工，在这里只活了半年左右，就被折磨死了。

在这里，活人和死人都是把头发财致富的来源。把头每騙来一个新的矿工，可以从日本鬼子那里領五十元的“募集費”；每死一个矿工，可以領到八十元的“吊慰金”。狠心的把头为了自己賺錢，恨不得矿工們尽快地死，好再招来新的。

日本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封建把头的家业，就是在这些累累如山的矿工尸体上建立起来的。一切都是为了牟取最大的利潤，他們对矿工們专横强暴、压榨、压榨、再压榨，直至榨到矿工只剩一副枯骨。然后弃之于荒山僻野！

英 勇 反 抗

日本帝国主义、买办和封建把头的殘酷压迫和剝削，激起了矿工們的无比憤怒，他們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抗和斗争。侥幸活着的老矿工和家屬們，讲到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怠工，是矿工們比較普遍采取的一种反抗形式。工人管这叫做“磨洋工”或“胡弄鬼”。他們說：“胡弄鬼，胡弄鬼，胡弄一会是一会。”大家下了井，常是一个人在外边“放哨”，別的人在里边歇气或睡觉。把头、外勤来了，“放哨”的工人便敲响铁管或运煤的铁溜子，听到这种信号，大家馬上装出干活的样子。

一人挨打，大家声援，这也是矿工們的一种斗争形式。一九四二年阴历七月，脚行工人出身的牛汉元，不甘心受敌人

的迫害，逃跑沒跑了，被“方家柜”的外勤抓回来。六个外勤接着他毒打。一位姓張的工人看到了，馬上跑回大房子，招呼另两个木匠說：“走！牛汉元快叫外勤打死了，咱們快去！”說着，他們提起斧头就闖过去了，高声喝道：“住手！看你們誰敢再打！”不少工人，这时候也都气憤地圍上去。外勤一看不好，才松了手。

矿工們还利用各种巧妙的办法，毀坏机器、設備，或制造生产事故，不給日本鬼子多出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六月，日本鬼子很需要煤。就在这个时候，一井有一个运输工人，和矿工老左核計，采取脫鈎跑車的办法，减少产煤量。一天，他們从井下車場子往左边的一条坑道里“下車”，把煤車挂半截鏈，插半截插銷，結果挂了十二辆矿車，脫鈎“跑”了十一辆。这些車象从高山上奔騰而下的巨石一样，轰隆轰隆飞撞下去，一下撞倒了七架支撐坑道的木棚子，使以后的煤車沒法通行。当天，全井少出了不少煤。有个叫长宅的日本鬼子，拿着鐮头棍找那个运输工人說：“‘登鈎的’！車的，怎么跑了？”那个运输工人說：“插銷自己蹦出去了。”日本鬼子說：“車的跑了，錢的不給你！”那个运输工人說：“不給工錢，我們就不干了！”說完便同五、六个运输工人一起走开了。日本鬼子虽然凶狠，但也怕工人們把事情鬧大，出不了煤，赶紧說：“回来，錢的給你！”运输工人气呼呼地說：“給錢也不干了！”說到做到，他們真把活計撿了，一連三天也沒下坑去給鬼子运煤。

不甘忍受痛苦的矿工們常常成群結伙地逃跑。逃跑，显示了矿工們对旧社会的强烈不滿和反抗。一九四三年秋季的一天，晚上七点多钟，“南二号”独身大房子里有八个人一起冒雨逃跑了。到了电网跟前，領头的工人指着一道水沟对另几个工人說：“快，你們先往外钻吧！”他主动留在最后，拿着铁鍬給大家打掩护，七个人陸續钻出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当他順着沟口往电网外钻时，不幸被外勤发现沒有跑了。經過一陣毒打，外勤把他押到伪“东城采炭所”的“老虎系”去了，以后就再也沒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解放前，在日伪反动統治时期，“方家柜”的矿工們的各种反抗斗争，虽然是自发性的，成效也往往是很小的，但它却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精神。我国的革命历史证明，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这种英勇斗争精神，一旦取得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就变成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力量！

日 月 換 新 天

辽源煤矿从解放到现在，刚刚过了十七个年头。但是，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騎在工人头上罪大恶极的“方家柜”大把头蔡九龄，已经被人民政府在矿工墓前枪毙了。他的铁象跪在矿工墓前，受着历史的惩罚，亿万人的责骂。

当年的大房子、卡子門和鬼子殘害矿工的狼狗圈，現在

都已經不見痕迹。在過去的大房子的遺址上，早已蓋起了一幢幢新的職工宿舍和礦工子弟小學，那兒經常傳出來“東方紅”的嘹亮的歌聲。

當年的童工譚金章、鞠永發，他們不但都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而且都已經成了共產黨員，正愉快地、勤奮地勞動着。譚金章當上了革命幹部，曾被選為市人民代表。鞠永發被評為先進生產者，被譽為“紅色管家人”。

當年被摧殘的老工人，有的當了礦、井的領導幹部，有的已經退休，正在享受着晚年的幸福生活。

如今的礦井，面貌已經煥然一新，工人真正當家做了主人。黨提出了安全生產的方針，為了保障工人的生命安全，增設了許多安全措施，很多笨重的體力勞動已經為機械化所代替。

但是，人們並沒有忘記過去，在人們的腦海里都深深地刻印着：

牢記階級苦，不忘血淚仇！

苦难的二十一年

吉林省辽源矿务局西安煤矿工人 魏本厚 口述

辽源矿务局“四史”编写小组 整理

我在旧社会生活了二十一年。这二十一年，我受尽了封建地主、封建把头、资本家、日本鬼子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他们逼着我从农村到城市，从关里到关外，从工厂到矿山，使我受尽了苦难和辛酸。

一

我的老家是河北省冀县北安成村。我生下来刚两个月，父亲就因为给地主扛活累死了。母亲为了拉扯我和姐姐，起早贪黑地给地主纺线；我五、六岁的时候，就和姐姐下地挖野菜、剥树皮。娘三个过着缺吃少穿的生活。

我十三岁那年，被介绍到天津一家帽铺当学徒。“学徒学徒，三年为奴”，这话一点也不假啊！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掌柜的家里端尿盆子、打水、扫地、擦桌子，然后再去

一个个地招呼人家洗脸；这些事做完了，还得去给女掌柜的看孩子。如有不顺他们心眼的地方，不是挨打就是受骂。有一次，女掌柜的突然早起了一个钟头，我还没有醒来，她便在楼上没好气地叫喊：“魏本厚，几点钟了！尿盆子还不倒，你想熏死我呀！”我被惊醒了，急忙往楼上跑。刚跑上楼梯，女掌柜的就一把扭住我，骂道：“你他妈的可享福！”我心里又气又恨，一使劲甩开了她，尿盆也没端就下去了，心想：你爱咋的就咋的。这下子可惹出事来了，掌柜的一连两顿没让我吃饭。我也火了，心想：去你妈的吧，给我吃我也不吃了！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我就悄悄地溜走了。可是，我往哪里去呢？回家吧，不仅照样受苦，也无法向娘交代。我离家时母亲告诉我：“孩子，到了天津，在工厂里好好干，挣下钱就回来接我。那时候咱就得好了！”可是，半年多了一个子儿没挣到，连盘费都没有，怎么能回家呢！没办法，我就在天津市满街流浪，白天要着吃，晚上睡在楼檐下。

逃出帽铺的第六天中午，我正在马路上要吃的，迎面来了一个戴礼帽的人（后来才知道这家伙是个人贩子）。这人问我的来历，我一五一十地说了。他笑呵呵地说：“小孩，我可怜可怜你，给你找个吃饭的好地方，保你有吃有穿有钱花，还可以回家看母亲。”我一听，可乐坏了。心想：这回可碰上运气啦！

我跟着那人转弯抹角地进了一个大院子。在一个屋门口坐着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领我的那人向他一撇嘴，喊了一

声“又一个……”那个家伙把我推进屋門，当的一声又把門关上了。我进屋一看，躺着的，坐着的，滿地是人。牆角放着便桶，那股味真叫人恶心。有几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湊到我跟前，問我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我告訴了他們。其中有一个比較大一点的說：“坏了，我們受騙了！我們来时，他也是这套話。”我說：“管他呢，能吃饱肚子到哪儿都行。”

第二天一大早，一个家伙吆喝着大伙排成队，把我們一百三十多人押上了悶罐車。

到了山海关，都被赶下車来，叫我們一个个排队，脫掉衣服，由日本人在每个人的胸膛上盖一个大紅印，又給我們照了象，发給一个不知是“劳工证”，还是“出关证”的玩艺儿。然后，又都被押上了悶罐車。大家在里面，見不到天日，也記不清坐了几天車，最后来到了西安（現辽源市）。一下火車，我們又被押上两辆黑篷子汽車。汽車轉弯抹角地走了一大陣，最后停在两栋大房子跟前（后来我才明白，用黑篷子汽車拉我們繞弯子，是为了讓我們迷失方向，将来沒办法逃跑）。大房子由两层铁絲网和一层电网包圍着，門口站着两个拿木棒子的人，氣勢汹汹，真象走进了監獄門一样。

我們被押进了大房子。进屋一看，南北两个通天炕，炕上横七豎八地躺了不少人。有的人枕着磚头，有的人盖着破棉花套，有的人披着麻袋片，人們的头发都老长老长。我心想，这到底是些什么人？是什么地方？让我来干啥呀？

离我不远，有个患病的老人不住地呻吟。我問他：“大爷，你咋的啦？你們是干啥的呀？”老人好象觉得奇怪，挺費勁地問我：“你們不是来‘方家柜’挖煤的嗎？这就是‘方家柜’的工房子。”說完，又揉起胸脯来。这回我才明白，我們到了煤矿。就在这个时候，門口突然闖进两个人，走到老人跟前，恶狠狠地罵道：“媽的，你胡咧咧什么！”說完，批着胳膊就往外拽。老人哀告着：“行行好吧！我的病还能好啊！別拽出我去呀……”我們这些新来的人，一齐圍上去問，这是怎么回事，那俩人說是“消灭疾病，防止傳染”，不讓我們多嘴。說着，就把他給拖走了。后来听人說，那位老人被扔到“病号房”里，不久就死了。在“方家柜”的矿工，得了病，不能干活，就是这样的下場啊！

二

“方家柜”是伪西安煤矿一家最大的柜头，对工人的剝削和压迫是十分殘酷的。当时人們都說：“馬怕下坑內，人怕上‘方家柜’”。到了“方家柜”，就象进入了老虎口。

到“方家柜”的第二天，我們一起来的人，大清早就被轰起来，到外面站好队，每人发一个柳条帽，上面歪歪扭扭地印着个紅色的方字，好象一片血迹。

这时候，一个横眉豎眼的家伙（据說是炕长）吆喝着：“都站好，檢查檢查！……”这个家伙，把路上发給我的三元錢拿走了还不算，他看我穿的衣服还挺好，就对我說：

“你的衣服下坑不能穿，脫下来我給你保管。”我剛来，不懂“規矩”，就把衣服脫給他了。他順手扔給我一件破爛的棉袄。我接过棉袄一看，上面滿是汗斑和血迹，又腥又臭，剛想回头要我的衣服，那家伙已經走得沒影了。这时，走过来一个把头，把我們押到飯房，每人給一碗高粱米飯，飯里尽是高粱壳和砂子，有人还在盛飯时发现了死老鼠，結果，这頓飯誰也沒吃好，把头就催逼着下坑。

坑里黑洞洞的，我不敢进。把头在后面敲了我一棒子，我还是不进，他就又敲了我一棒子，我才最后一个被迫入了坑。由于井下条件恶劣，又加上活累，上班第二天我就生了病，渾身发燒，心里难受，硬挺着干到下班，大家扶着我回到了大房子。

第三天清早，大家照样是列队点名。点到我的名字的时候，大家都說：“他病了。”薛把头提着木棍子，闖进大房子，“啪”的一声敲一下炕沿：“你起来不起来？”我說：“我有病，干不动活。”他一把把我抓起来，“啪”就是一个嘴巴，打得鼻孔窜血。然后把我拉出了大房子逼我去上班。大家帮我說情，薛把头却恶狠狠地罵道：“去你媽的吧，你們都是一道貨。快，都給我下井！”

我被逼帶病下坑后，一个老工人囑咐我：“你先在小水沟洗洗臉上的血。活，你能干多少就干多少。”我正在弯腰洗臉，一个把头走过来用棍子捅我，叫我快去干活。我回头瞪他一眼，又弯腰去洗，这家伙看我不理他，就劈哩啪啦的

給我几棍子。他打完后，又走过来一个小把头狠狠地踢我两脚，让我快去干活。他們走后，我老觉着心里憋气，总想找个出气的办法。这时，一串炭車嘩啦嘩啦的过去。我一看，有了！我咬着牙爬到前边的道岔口把道岔子从左边扳到右边，不一会，又一串炭車卡啦卡啦地过来，跑到岔路口希里嘩啦一陣响，就“耍龙”翻觔斗啦。我怕把头找上来，赶紧溜回掌子面，心里特别高兴。

“方家柜”从不按时給工人开支。即使开了支，也是东一笔西一笔，什么房錢、工具錢、灯錢、飯票錢等等，扣的剩不了几个。甚至有些人倒欠了柜上的。我到了“方家柜”以后，一連几个月沒有开到工資。工錢被他們勒索去还不算，到了冬天，柜上連棉衣也不給发，让矿工們挨着冻去給他們卖命。我沒衣服穿冻得受不了，就把我带来的一床破被，中間掘了一个窟窿，把头伸进去，白天当棉袄，晚上当被盖。就这样也得天天下井去給他們挖煤。

“方家柜”只知道榨取工人的血汗，不管工人的死活，拿工人的生命根本不当回事。

有一次，剛剛放完炮，蹠掌子的把头就拿鎬把往里赶我們。我們进掌子一看，要冒頂，大伙就退出来了。蹠掌子的把头一看我們退出来了，二话沒說，举起鎬把就打，硬逼着我們进掌子。我們剛进去就冒頂了，當場就有几个人被压死在里面，我的胳膊也被砸伤了。还有一次，跟我一起被騙来的一个小同伴，下班后走錯了路，被把头拖回大房子，按在

炕沿上，几鎬就打断了气，并且还指着小同伴問我們在跟前的几个人：“他是不是要逃跑？嗯！”我們說：“他是走錯了路，不是逃跑。”这下子可把把头气紅眼了，硬逼着我們跪下，两个人一对打“协和嘴巴”。誰要不打，他就掄鎬把，气的大伙咬牙切齿，心里直罵。

三

“方家柜”的打罵、虐待和压榨，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就打定主意逃跑。不然再呆下去早晚也得丧命。怎么跑呢？我曾几次和同伴小刘商量，找机会一起逃跑。

一天夜里，我倆趁炕长熟睡的时候，摸出了大房子，偷偷地从圍墙底下一条小水沟钻出去，一直朝西北边的山上跑去。心想这回可算离开了火坑，哪曾想一路受难，还是找不到活路。我們赤着脚跑了一宿，跑到了三道河子（西安城郊），被一个姓刘的地主拦住，硬逼我們給他放牛。他怕我們俩在一起要跑，就让我給一家姓于的地主放猪。

过了七、八天，我們俩又在山上碰着了，真亲热。我俩一核計，扔下猪和牛，又跑了。

天黑洞洞的，我們俩爬山越岭，钻树林子，就象閉着眼睛往前摸。这时我的脚不知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疼的不敢动，就从身上扯一块布片把伤纏住。小刘扶着我一瘸一拐地往前走。第二天，我的脚肿得厉害，疼得我再也走不动了。我怕連累了小刘，就让他先走。小刘舍不得扔下我，經我再

三催促，才流着眼泪离开了我。从那以后，我俩再也沒見面。

小刘走后，我独个儿东奔西走，后来又回到了西安，一瘸一拐地到处流浪，馬路就是我的家。

有一天，我在馬車厂子碰上了三个日本警察，他們看我渾身上下弄的这个样子，就問我是什么人，我說是中国人，他就“啪啪”打了我两个正反耳光。他們又問我是干什么的，我說是討飯的。其中一个家伙不信，說我是逃跑的，就叫另一个鬼子去打电话，叫来了两个“方家柜”的狗腿子。这两个家伙一看是我，就又把我把拖回了“方家柜”。

四

“方家柜”将我抓回来以后，看我脚坏了不能干活，就把我扔进了“病号房”。“病号房”实际就是死人仓库，誰进了“病号房”，那就离死不远了。我在这里呆了三个月，亲眼看到我們的阶级弟兄連連不断地被送上了“方家坟”。因为我只是脚被扎坏了，沒有别的病，又加上阶级兄弟的照顾和掩护，我才死里逃生。我在“病号房”的日子里，有些伙伴常常給我送飯。我知道这飯是他們自己忍饥挨餓一口一口省下来的，我每次吃他們送的飯，都感动得流下泪来。过了三个月以后，我的脚漸漸地好了，就被把头押回到大房子。

旧社会，我們煤矿工人是沒有人身自由的，把头把我們騙到手，不仅可以任意压榨和剝削，还可以把我們当成商品自由买卖。我病好不久，“方家柜”就把我們一批工人卖给

了“董家柜”。

“董家柜”和“方家柜”没什么两样，工人弟兄們都是一样受苦受罪。上第一个班的时候，大伙儿說我有病剛好，身子受不住，劝我躲一躲。我确实觉得身上沒勁，心想：也好。我跳进一个土坑里，大伙把坑口盖上一块板子。有个姓姬的把头走过来問道：“魏本厚哪去了？”大家說不知道。这个小子就四处寻找，我到底被他看見了，他走到我跟前，一脚踢开板盖，使勁用脚踹了我几下。我爬上坑，他又連打帶罵：“他媽的，你們是我們花錢买来的，还想要熊啊！快，快干活去！”我心里暗暗地罵道：“去你媽的吧，你們拿活人做买卖不算，还这样欺負我們。”过了几天，“劳务系”配給劳作服，——这是百年不遇的事。我想：我干了五、六年了，这回該領件衣服了吧！我去領时，他們却說：“你們是从‘方家柜’来的，沒你們那份！”一听这句话，我的肺都要气炸了，一甩手就走开了。

五

日本鬼子、把头們的凶恶、殘暴，並沒有吓倒我們。我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就起来和他們斗争。特别是快要解放的时候，日本鬼子、把头对矿工的剝削、压榨更加殘酷，我們无法生活下去了，就一伙伙抱成团，找机会和他們干。

眼看着五月节就要到了，“董家柜”还不給工人开支。拖家带口的工人弟兄們想买点米、菜，手里分文沒有。可是，柜上却杀猪宰羊，欢乐得很。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姓李的老工人串联了我們一大帮

人，拿着工具冲进了柜房，老李头一个箭步上去揪住董把头质问：“你叫我們活不活？你到底开不开支？”董把头一看大家都十分愤怒，就随口吩咐管賬先生开柜，每人“暫借”十元錢，他趁大家領錢的机会便跳窗戶逃跑了。董把头一跑，大家一轰，鬧开了柜房。鍋里的肉，籠屉里的包子，都讓我們吃了，茶壺茶碗，桌椅板凳，也讓我們砸了。

砸柜房不几天，大伙又砸过一次領灯房。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一个叫賈三营的工人，在領灯房前苦苦哀求換个好灯。矿灯，就是矿工的睛睛，沒好灯怎么能下井采煤呢？可是，灯房子里的人偏偏不給換，他就順口罵了一句。管灯房子的人出来，揪住他的衣領就往里拖。大伙一看就急眼了，拣起石块瓦块就打，灯房的玻璃被打得希里嘩啦。然后，大家心里痛痛快快地跑掉了。

一九四七年，一声炮响，在人民的欢呼声中西安解放了。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們从苦海里救了出来，并領導我們鬧革命，斗倒了封建把头和汉奸，实行了民主改革，建立了新政权和新制度。从此，我們矿工当了家，做了主人，結束了当牛当馬的生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加入了偉大的中国共产党，并当上了干部。党和政府还帮我找到了分別八年之久的母亲。我也結了婚，成了家，現在已經有了五个孩子，两个上小学，一个上中学，一家人日子过得火紅。

想想过去，看看今天，我深刻地懂得“苦从何来，甜从何得”呀！我一定好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的童年

吉林省辽源矿务局太信煤矿 譚金章 口述
一井党总支宣傳委員

辽源矿务局“四史”編写小組 整理

每当我看見孩子們系着紅領巾上学，欢欢乐乐地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的童年。

逃荒被騙入虎口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临朐县富家裕村。我九岁那年，日本鬼子佔了我的家乡。他們和汉奸队、国民党九旅、十七旅勾結在一起，到处抓工要粮，搶东西，燒村庄，三百多戶的富家裕村，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廢墟。村里的人餓死的餓死，逃荒的逃荒。就在这年的冬天，我爹用一对筐，挑着两个弟弟，娘夹着两床破被領着我，离开了家乡。我們一家五口人，冒着寒风，踏着冰雪，到处乞討，到处流浪。后来听說益都有招工的，我們就一連走了三天三夜，赶到了益都。

原来是西安煤矿日本鬼子的大把头譚庆池来这里招工。

他花言巧語地說：“乡亲们！跟我上黑龙江、牡丹江盖房子去。那儿比山东强，吃的是大米白面，活还不重，挣钱又多。干六个月就送回来。嘿！老乡，人生一世也得见识见识呀！”我爹信以为真，就报了名。

谭把头把我们三百多个被招募来的人，全集中到一间大房子里看起来。第二天又统统地把我们押进了三节闷罐车。他怕我们跑，把车门用铁丝紧紧地撑住。每节车厢里挤一百多人，拉屎撒尿全在里面，又臊又臭，熏得人透不过气来。车上的人连口水都喝不着。火车正走着，一个姓张的突然得了病，发高烧，一阵阵昏迷不醒。当他醒过来时，喃喃地叫着：“我渴……水……”狠心的把头看到后，硬说他得了传染病，就打开车门，把这位姓张的病人扔下了火车。在旧社会里，咱们穷人的命就这样不值钱哪！

在济南换车的时候，把头看守的更紧了。把男人和妇女老幼分成两伙，每人发给一个半尺宽一尺长的木牌子，挂在脖子上。还给我们照了单身象，发了“过关证”和白布黑字的袖标。“过关证”上贴着自己的象片，下面印着“华北劳工协会”几个字。袖标上标着“西安矿业所”。一看到这些，我们就知道受骗了。那时，关里人也听说过，当劳工下煤窑性命难保！但是，我们已经上了圈套，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看得那么严，就是长个翅膀也难飞呀！何况我们又是拉家带口呢！只好硬着头皮挺下去。火车到了山海关，我们又被赶下车。人们都携儿抱女地排一长串走着。走到门口，每人

发一个橡子面餅子。我排到門口的時候，发餅子那个家伙不知为什么打了我一个嘴巴子，把我推到一边，沒发給我餅子。回到悶罐車里，我又气又餓，抱着爹的大腿哭。做父母的看到孩子挨打挨餓，心里怎么能好受呢？我爹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好半天沒說出一句話來。他把領的餅子給我和弟弟吃了，他却一天一宿沒吃到一点东西。又經過三天三夜，火車把我們拉到西安（現遼源市）。

到西安后，把头就把我們帶到太信三井。有二十多个“劳务系”的外勤走狗凶神惡煞般地監視着我們。大把头譚庆池也扯下了伪善的面具，耀武揚威地說：“老乡們，你們要放明白点，这里是日本人的天下。常言說：‘忍为貴，和为高’，遇事可不能太随便，太任性，應該好好地为日本人出力。若不好好干，可別說我姓譚的不客气。”

他訓完話，外勤走狗們就把我們这三百多人，赶进用鉄絲网圈着的两栋大房子。里面有四鋪炕，破窗戶紙被风吹得嘩嘩地响。人多房子小，挤得人透不过气來。房子外面有把头、外勤昼夜地看守着，大人小孩都不能随便出入。矿工好象犯人一样，上、下班都有把头押送。吃的哪是大米白面呀！淨是些发了霉的苞米面和掺壳子的高粱米，里边的砂子多得叫人合不上牙，还有耗子糞。就这种飯食，还是天天配給。爹上一天班，掙三角錢飯票，只能买一小碗高粱米飯，家里每天給七两苞米面，里面还掺一半橡子面。我們全家就靠这一点粮食糊口度生。

当牛作馬受剝削

我爹在太信三井挂了号，領了一双水袜子，一个柳罐斗，一把大铁鍬，就下井了。

我爹沒日沒夜地干，一干就是十二、三个小时。全家老小眼巴巴地盼望到月头能开几个錢，哪曾想，开支时，管賬的算盘子一撥拉，什么旅費、安家費、工具費、石炭貨費、事务印刷費、飯票等等扣了一大堆，不但一个子儿沒得到，还欠了債。沒办法，我就每天天不亮，偷偷地爬出铁絲网，上街去要飯。有时轉一天能要到一点殘湯剩飯，有时連一点剩飯也要不着。家里实在生活不下去了，爹和娘商量，决定把家里仅有的两床破被卖掉。虽然是自己的东西，也不敢明着拿出去卖，若是叫把头看見，不是沒收，就得挨打。娘只好把被拆了，把被面圍在我的身上，趁天還沒放亮我就爬出铁絲网，到破烂摊卖了六角錢，买回一些烂土豆来，对付着度命。

左盼右盼，好容易又盼到第二个月开支，寻思这回能得几个錢。爹上白班，我拿着爹的手戳代替他去領錢。“劳务系”的門口挤了好多人，吵吵嚷嚷地往上拥。我的个子小，蹺起脚举着手戳，拚着全身的力气才挤上去，突然叭的一声，我的手一陣剧痛，原来是外勤朝我的手狠狠地抽了一籐条子，手戳被打丢了。这时，“劳务系”一个姓郑的狗腿子說：“去，去！他媽的，沒有名章不給开支！”过几天，爹刻了手戳又去領錢，那狗腿子又說过了時間，不給开支。那

这个时候，无论是外勤把头，还是“劳务系”里的人，都是日本鬼子和大把头的走狗。他们用各种办法吸工人的血，勒索矿工的工钱。因此，我爹天天累死累活地给他们干活，却一连两个月没得到一个子儿。

爹爹挣不来钱，家里的生活更没着落了，我娘就给我缝了一个小布口袋拴在腰上，每天偷偷地爬出铁丝网，拣些烂白菜叶子回来糊口。到了开春种地的时候，烂白菜也没有了，就只好弄些野灰菜来充饥，吃得我们全身浮肿。特别是我爹，由于活累、吃不饱，身体越来越坏，成天喘吁吁的，头上冒冷汗，两腿打哆嗦，活动一下都费劲，哪还有力气干活呢？我劝爹说：“爹，歇歇工吧！”我爹含着眼泪告诉我：“孩子，不上班不仅三角钱饭票得不到，就是催班把头的榔头棍，咱们也搪不起呀！”

有一次，爹正在井下干活，矿灯忽然灭了。矿灯就是矿工的眼睛，没灯怎么能干活呢？我爹正在弄矿灯的时候，有个外号叫臭大棒子的把头走进来，硬说我爹“磨洋工”，不容分说就是一顿大镐把，把爹打倒在地上，一直打得不能吭声了，他才住手。幸亏被一个工人抢救出来，才没有惨死在井下。

病栋里面难逃生

从此，我爹就病得起不来炕了。不能上班，三角钱饭票也挣不来了。一家人忧愁得终日啼哭，没几天，就全病倒了。鬼子、把头不但不给治病，还说我们得了伤寒病，又专

門把我們住的地方用鐵絲網圈起來，說這是“疫病區”，不准通行。我們被關在裡面，缺吃少喝，我三弟就在這個時候活活地餓死了。鬼子、把頭看我家人死的死，病的病，從我們身上再也榨不出啥油水來了，就干脆把我們拉到病棟去了。這哪是活人呆的地方啊！這是一棟四面不透風的死屍房。苦難的礦工們，被鬼子、把頭吸干了血汗、榨干了骨髓，就全扔到這兒來。房子外面用鐵絲網圈着，裡面的活人和死人滾在一起。

被拖到病棟里的人，只能吃到很少一點飯，想喝口水也有困難。他們渴了，都得自己拖着身子爬到從鐵絲網外面伸進來的水管子跟前去喝水。有些難友不等爬到地方就咽氣了。這裡哪天不死人哪！三個、四個，最多時一天死十二個。有的甚至還有口氣，正喊着“我要喝水”，就被堵上了死屍堆，然後就把他們扔進太信礦東山的“萬人坑”，叫狗撕扯着。那些象吸血蟲一樣的把頭，不僅吸活人的血，還卡死人的油。我們死去的礦工弟兄身上的衣服，往往被他們扒得溜光。

五、六月間，死屍房里臭氣熏天，蛆蟲在死人和活人的身上爬來爬去，蠅子嗡嗡地來回亂飛。我們一家人都病的爬不起來，只有我稍微輕一點。我爹和二弟躺在一鋪小炕上，我和娘躺在地下。忽然，跳到娘身邊一個蛤蟆，我娘一把就抓住了。她嘴里喃喃地說：“金章，你把它，給……我煮煮，我要吃點肉……”說着，她咽了氣，手里還攥着那個蛤蟆。

我瞅瞅爹，他一个劲儿地说胡话；看看二弟，他在一口一口地倒气。……拉死尸的来了，就把我娘、二弟和其他死人一起拽出去了。我抽抽嗒嗒地哭着，爬到我爹的身边。这时，我爹睁开那无神的眼睛，因为不见了 he 身边的二孩子，就问我：“你弟弟呢？”我一听，就哇地一声哭起来：“弟弟、我娘，都死了。”就这样，我们一家五口人，就剩下我们爷俩了。

在这以后，我爹病得更重了，整天昏迷不醒。一天夜里，风雨交加，死尸房里又哭又叫，真“森”人哪！我紧紧地倚偎在爹的身旁。这时，爹爹又睁开了那双无神的眼睛，用他干枯的手，抚摩着我的头说：“孩子，咱们全家在山东活不下去，才逃到关外来的呀！谁想到天下到处都一样。这年头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哇！”说到这里，爹哭得说不出话来。过了老半天，他才气喘吁吁地说：“咱们家来了五口人，就剩下你这条根了。孩子，等你长大以后可别忘了啊！”说完，就哆哆嗦嗦地把自己的棉袄披在我的身上。我看他浑身冒汗，嘴一张一张地喘着，看样子还要说什么，可是什麼也没说出来就咽气了。可怜的爹爹，实指望能逃个活命才闯了关东，哪曾想就这样凄惨地丧了性命，死后连块破席头都没捞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爹娘和弟弟埋在哪里。

童年下井遭摧残

全家人就剩我一个了，从山东一起来三百多人，也死的死，逃的逃。我走投无路，一天到晚老是哭。把头说：“你

他媽哭什么？再哭把你扔進死尸坑里喂狗！”有一天，趁他們不注意的時候，我偷着爬出去了，眼望着太信的東山哭喊着。到了晚上，我不敢再進病棟。有時在太信三井的伙房爐旁睡覺，有時就躺在人家的房檐下，白天就去挨門要飯。有一次，我在伙房的爐旁睡着了，被“譚家大櫃”的把頭看見，他抓住我的頭髮罵道：“小混蛋，你他媽的不干活，在這裡干什么？你說！”我哭着說：“我小，干不動。”“他媽的，干不動？干不動就把你扔狗圈去！”說着，就拽着我的耳朵把我拉走，給我一個柳罐斗，一雙破膠鞋，一把鐵鍬，逼着我這個十三歲的孩子給他們下井挖煤。

我穿着爹留下的那件大棉襖，用草繩扎上腰。下身穿着一個姓劉的工友死時留給我的破褲衩。沒穿幾天，棉襖就被從礦燈里流出來的硫酸水燒爛了，天漸漸地冷了，棉襖露着肉，凍得實在受不了啦，就到井下風門那兒砍麻袋片，用放炮的鋼絲拴着圍在腰上。在一塊干活的工友，給我出主意，叫我去要件衣服。我一走進“勞務系”的門，就對日本鬼子說：“給件衣裳穿吧，要不我就要凍死了。”他們不理，我一看再說也無用了，就扛起鍬往外走。剛走出十來步，一個姓孔的外勤把我叫回去。我尋思大概能給件衣服。誰知道，剛進門，日本鬼子小田中上來就打我一個嘴巴，把我打一個趔趄，我剛想跑，又挨了一腳，這家伙好像還不解恨似的，順手又拿起笤帚把子，把我打的渾身沒有一點好地方，當時就昏過去了。後來，一個姓王的工友把我架回去了，半夜才

苏醒过来。我暗暗地想：“这是什么世道啊！做矿工的連說話要衣服的权利都沒有，还有什么活路呢？”

第二天，我本想歇工，可是把头不允許。他們来催班，有一个姓崔的矿工，病的起不来炕，二把头李清貴把他拖下炕来，劈头盖脑地暴打一頓，还說：“脑袋硬就得上班。”我一看这个架式，也就只好去下井。因为連挨打带受冻，渾身沒勁，稍稍休息一会，就被一个管扫道的鬼子小谷河看見了，他說我“磨洋工”，一脚把我踢倒在小铁道上。我爬起来，心里恨极了，但还得去給他們干活。

轉眼就到了冬天，天冷得很，漫天飄着鵝毛似的大雪，我冻得縮成一团。工友們看我实在冻得不行，就劝我再去要衣服。我胆战心惊地迈进了“劳务系”的門，看見日本鬼子正給一个工人发衣服，我也把手戳递上去了，他打量一番，看看再不給我发衣服，我就无法替他們卖命了，所以才发給我一套衣服。可是还要到催班的楊外勤屋里盖手戳。狠毒的楊外勤，瞪着紅眼珠子跟我要衣服：“給我一件！”我說：“就这一套衣服，給你一件我不得冻死嗎？”他恶狠狠地說：“誰他媽的管你冻死不冻死！”說着說着，就連搶帶夺地把棉袄拽去了，我只剩了一条棉褲。这是一条大号棉褲，我穿起来褲腰頂到胳肢窩，褲脚拖地。没办法，就到井下砍断一节电綫，剥下外面的胶皮，把褲脚擡到腿肚子上綁住；把褲腰迭下来，用草繩子扎上，上身还得照旧穿着爹爹留下的破棉袄。睡觉的时候，就把褲腿褪下来，用草繩扎

紧，把两腿伸进去，棉裤腰往上一拉，身子往里一缩，就睡在里边，这条大棉裤就成了我的被褥。吃的就甭提了，不是酸豆腐渣的窝窝头，就是掺着壳子的高粱米饭。有的人没有碗筷，把头上戴的柳罐斗摘下来当碗，用手抓着吃。晚上睡觉的时候，大伙都得朝一个方向，后一个人的脸对着前一个人的脊梁骨，谁不许看谁，不许说话。有一次，我躺在炕上，冻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悄悄地和一个同伴说声“冷”，炕长听见了，就气势汹汹地走到我们的跟前，把我们俩从炕上拖下来。他问：“你们喳喳什么？要跑吗？”我说：“我们唠唠嗑还不行吗？往哪跑还不是……”没等我把这句话说完，他就象要吃人似的，瞪着两只三角眼，逼着我们俩跪下互相打嘴巴。我们都是苦难的兄弟，怎么能下手呢？于是他就用镢头棍打我们。我心里恨极了，本想和他讲理，可是在那个时候，哪有矿工说理的地方呢！

那时候，日本鬼子、把头是要煤不要人，他们根本不管矿工的死活。冒顶、瓦斯爆炸事故不断发生。有时候他们明明知道事故就要发生，可是还硬逼着矿工去送命。有一次，太信三井十号大掌子已经开始冒顶了，碎石头不断地掉下来，但是，日本鬼子、把头还象催命鬼似的逼着矿工进去扒煤。不进去，他们就打，结果进去十八个人，全被埋在里面了，当时就砸死八个。这种事，当时很常见，哪天都要从井里往上拽死尸。开始，鬼子为了胡弄人，挡活人的耳目，还为死难的矿工钉个六块板的小棺材，贴个名签就叫家属来认。后来，

死的人太多了，他們就干脆把死尸一古脑儿推到“万人坑”里。“万人坑”填满了就送到“炼人炉”，有一天，一次就炼了三十八个人。不知有多少矿工，无辜地被他們夺去了生命。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整整熬过了六个年头。

矿工翻身做主人

一九四七年，西安解放了，矿工的苦日子总算熬出来了。党领导我們打倒了騎在矿工头上的封建把头和外勤，矿工成了矿山的主人。我脫去了麻袋片，换上了矿工服，心里那股乐劲，真是无法說出来。一个旧社会的流浪儿，被人瞧不起的“煤黑子”，变成了新社会的主人，怎能不高兴呢！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一九四九年秋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不久，党为了培养我，就送我上学念书。旧社会剥夺了我学习的权利，剛解放时，我一个字不識，当采煤組长做記錄时，用“×”代替人，用“○”代替鐵。現在我已經成了一个有文化的干部。

十几年来，我这棵在旧社会被苦水泡大的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了。先后当过采煤組长、段长、工会主席、党支部書記，并且被当选为辽源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次出席过全国和吉林省的先进生产者會議。这是过去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我觉得党和人民給我的荣誉太多了，而我做的工作太少了，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并且要把我的家史傳給后代，教育他們永远革命。

永 不 忘 的 仇 恨

黑龙江省鸡西麻山煤矿政治处副主任 許怀森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原南皮城里。一九三八年八月，一連下了半个月大雨。一天半夜，一陣陣“轰隆！”“轰隆！”的大炮声，把我們震醒。只听得外边啼哭喊叫，乱成一片。邻居許大嬸站在門外喊：“鬼子要进城囉！你們还不逃命？”我們一家八口，我娘是小脚，大哥十六岁，鬧病两三年沒有下过炕了，我八岁，二妹五岁，三妹三岁，小妹才两个月，——这可怎么逃呀？我爹一看这副光景，賭气地說：“反正逃出去也得餓死，干脆就挺着吧。”大哥难过地望着娘說：“娘，我已經不行了，不要連累你們，快領着弟弟、妹妹逃命吧！”我娘扶起大哥說：“不，孩子，要活咱們一起活，要死咱們死在一块儿。”全家大小，哭成一团。

炮声越来越响，舅舅冒着大雨来接我們。爹和舅舅弄个大筐籬抬着大哥，娘抱着小妹，我和姐姐領着二妹和三妹，

挤在人群里，向城南逃跑。一路上，丈夫找不到妻子，孩子找不到爹娘的哭声叫声，和炮声雨声混成了一片，好不凄惨！重病的大哥，哪里经得起这顿折腾，一到舅舅家，就不行了，浑身僵硬。我娘哭诉着：“我可怜的孩子，你病了两三年，做爹娘的穷得没有给你买过一付药吃，……”就这样，大哥和我们永别了。

我们在乡村呆了四五天。我娘一直在哭着死去的大哥，三个妹妹吵着肚子饿，一个劲儿地要东西吃。我爹领着我们去东村串西村，想要点吃的，可啥也要不到，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好又回到城里。

家乡沦陷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难，爹不得已给刚满十三岁的姐姐找了个婆家，二妹让大姑妈领走，全家剩下五口人了。就是这样，也还没法糊口，万般无奈，只好到关东来刨煤了。

一九三九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我们一家被警察和招工的人贩子赶上闷罐车。一百多人挤在一个车厢里，车门上了锁，大小便都在里面，弄得又腥又臭，叫人发呕。车过唐山，我的三妹忽然得了病，发高烧，一个劲地喘着。同车的人都很关心，给三妹揪脖子、拔罐子，可是病情没有一点好转。到了吉林车站，那个狠心的人贩子上车了。我娘对他說：“先生，我孩子病了，你行行好，给找点药吃吧！”那家伙听说我妹妹病了，不分青红皂白，就嚷开了：“快把她扔下去！”娘听说要把三妹扔下去，急忙說：“她还活着

呀！怎么能把她扔下去！”人贩子捏着鼻子骂道：“他妈的，病成这个样子还不扔掉，要是你们都传染上了，到地方我拿什么交差！”同车的人都气愤地说：“我们不怕传染！”

“不怕传染？”那家伙冷笑了一声说，“你们是我花三元钱一个买来的，要都得病死了，我挣个屁呀！”不管同车的怎么说，黑了心的人贩子，走过来一脚把娘踢倒，抓起妹妹的小腿，一下子就把她扔到车外去了。只听得一声刺耳的尖叫，车门“嘭”地一声关上了。我娘爬起来，拚命地向车门挤去，嘶哑地哭着：“孩子，我的孩子！你们还给我的孩子呀！我的孩子还活着呀……”我的三妹就这样惨遭杀害了。

二

我们在又腥又臭的闷罐车里呆了整整十五天，才到鸡西。跟我们一起分配到黄泥河子长生煤窑（现恒山煤矿一井）的有六百多人，这六百多人被关进一栋破破烂烂的大工棚，男女老少挤在一起。房子里臭虫、跳蚤多得很。有些人被咬得受不了了，就在房梁上拴根绳子，捆两块木板，吊起来睡觉。我们吃的是高粱破子和发了霉的苞米面，而且是按出工的人的饭票平均分配，不出工的不给吃。在那个时候，不用说吃菜，就是想弄点咸盐粒也很困难啊。

每天天不亮，催班把头就拿着榔头棍进来，象赶牲口一样的催赶工人下井。我爹下班回来的时候，浑身湿淋淋的，冻得发抖。原来煤窑里的水很深，工人们都站在水里干活。

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有的工人累得抗不住了，偷偷地歇一会，叫溜掌子的日本鬼子、把头看见了，就被打得头破血流。因为工作太累，吃的又不好，闹病的工人越来越多。不到四个月，六百多人有一半病倒了。有的病人还没咽气，就被把头拉出大工棚，衣服被扒下来，活活冻死。和我们住在一块的有家姓隋的老两口和一个七八岁的小孩，病得很厉害，昏迷中叫着要吃黄瓜。这天，工人下矿以后，把头来了，骂道：“要吃黄瓜？想得倒不错！送你们到山上啃黄泥去！”说完，把隋家老两口的衣服扒光，拖到野外活活地埋了。那孩子成天在炕上打滚，又哭爹又哭娘。过了两天，把头进屋一看，小孩的病重了，二话没说，拎起小孩的两条腿往外面一扔，这个可怜的小孩就这样被活活地摔死了。才半年光景，我们六百多人，只剩下七八十人了。日本鬼子说：“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没关系。”

我们的大工棚被铁丝网围着，只留下两个门。一个门是专供抬死人走的，工人们管它叫“天堂门”；一个门是通往煤窑的，工人们管它叫“地府门”。鬼子在离大工棚一百多米的山头上挖了一个“万人坑”，天天往里扔死人。后来“万人坑”填满了，万恶的鬼子就把死人垛成两行，架上柴火，浇上汽油，成批成批地用火烧。白天黑夜，山头上“噼噼啪啪”、烟火漫天。我们看到那些被火烧着的工人兄弟的尸体，心如刀割。工人死了以后，狠心的把头就把不能干活的家属赶走，死活不管。有的中年妇女还被把头霸占或转手

出卖。穷人的生命就是这样連牲口都不如啊！可是大把头郭剛家里，一年到头，花天酒地。他仗着日本鬼子的势力，自己印“票子”、开鋪子。工人上一个班只发五角錢的“票子”。拿着郭家“王朝”发給的“票子”，只准到郭家“王朝”开的鋪子里去买东西。郭大把头把剗削来的錢，盖了个小戏园子，养活着一个三十多人的京戏班子，专门为他的日本老板和自己的小老婆取乐。这真是：一家欢乐万家愁！

三

我爹终于累病了。头痛，浑身沒勁。但为了一家四口人的生活，他硬挺着上班。有时候正干着活，就昏过去了。我娘說：“他爹，不要装硬汉子啦，你再有个好歹，扔下我們可怎么活呀！”我爹总是不听。后来病势越来越重，鼻子出血，发高烧，說胡話。有一天，陈把头气冲冲地跑进大工棚，用鎚把敲了几下我爹的脑門，罵道：“他媽的，有什么病？脑瓜骨还硬实就得干活！”說完，硬把我爹从炕上拉下来，爹站立不住，昏倒在地下，把头这才罵着走了。

过了几天，陈把头又来了。他見我爹的病沒有好轉，对我娘說：“不行啦，拉到山上去吧，省得傳染別人。”我娘一听說，吓得渾身发抖，赶紧对陈把头說：“陈先生，你行行好吧！他的病不要紧，我們一定想办法把他的病治好。”

“能治好嗎？”陈把头用鼻子哼了一声，“这叫伤寒病，还有个好？別做梦啦！让他早点升天去吧。”說完，抓

住我爹的手就往炕下拖。多亏工友說情，陈把头才答应給三天的期限。陈把头走了以后，有个工友对我娘說，“大嫂，我这儿有个偏方，快想办法，抓两付药給大哥吃，也許能好。”可是我爹十多天沒有上班了，連飯都吃不上，哪里还有錢买药呀？我娘沒办法，硬着头皮去找陈把头借錢。他冷笑着說：“你們到关东来的路費都沒扣完，还要借錢？想得倒挺美！”为了救爹活命，我娘把从关内带来的一套破被褥扛出去卖了两元錢，好歹对付着給爹抓了一付药。幸好，我爹吃了药，慢慢地見好了。

我爹病后，长期不能上班。我娘只好領着我和小妹出門要飯。那时候想要点吃的比上天摘星星还难。有一天，我們經過鬼子的門口，一条凶恶的狼狗向我們扑来。我正要用棍子撵狗，鬼子跑出来把我毒打一頓。我爹見我們早出晚归，乞討无門，就拖着軟弱的身子上班了。长年站在水里干活，第二年春天，爹的腰、腿上生了很多瘡，走路、哈腰都費勁。我怕爹再把身子累垮，就偷偷地去找把头，要求下井刨煤。爹和娘听說我要下井刨煤，都不同意。娘哭着劝我說：“孩子，你还没成人，下井能干什么呢？听娘的話，咱們就是要飯，也不能遭那份罪。”为了不让年老体弱的爹受累，我还是偷偷地下井了——那时我才十二岁。

把头分配我做杂役工，往井下送炮泥。从井口到井下工作面有半里多地，我一次要背三十多斤炮泥，压得腰酸背痛，晚上下工回来，渾身好象散了架子，躺在炕上不能动

彈。我虽然和大人一样拚死拚活地干，可是得到的工錢还不够养活自己，所以有时下班回来，还要强支着身子到四五里远的柳毛山上去打柴火，换点粮食吃。

我上班不到半年就病倒了，和爹一样，发高烧，說胡話，鼻子出血。狠心的把头，竟不顾我們的死活，把我們赶了出来。从此，我們又开始了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活。

四

轉来轉去一直沒找到安身的地方，几个月后，我們又回到了黄泥河子。我們滿指望找几个老工友帮补帮补，誰知我們住过的大工棚，又被新抓来的劳工挤得滿滿的。过去的老工友，不是死了就是被把头撵了出来，和我們一样过着流浪乞討的生活。我爹和媽眼看小妹妹越来越瘦，再熬下去怕会活活餓死，就咬了咬牙，把她送給黄泥河子的一个瓦工。

一九四三年八月，我家来到了麻山，我爹在麻山煤矿林大把头的手下挂了号。

林大把头叫林秀峰，是日本鬼子的忠实走狗，是麻山煤矿的大恶霸。在麻山煤矿，一提起林大把头，沒有一个矿工不恨得咬牙切齿的。他不仅无故地暴打、杀害工人，大量克扣工人的工資和口粮，而且还經常放賭抽紅，敲詐勒索，无所不为。

我爹被分配在一井当掘进工。因为我的病剛好不久，不能下井干活，爹把头一个月开支下来的錢，买了点糖葫芦、

烟卷，让我做个小买卖，以便赚几个钱，买件棉衣穿。哪知这点小买卖，竟被那些把头、特务和外勤看上了。他们经常到我家来赊烟卷。说是赊，其实就是白拿不给钱。有一天，林秀峰又到我家来赊烟卷。我娘知道他又是来敲竹杠，就说家里没有烟卷了。大把头林秀峰刚走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买烟的，我娘见他手里拿着钱，就把藏起来的两盒烟给了他。这时，门“嘭”地一声被踢开了，林秀峰拎着一根木棍，气冲冲地站在门口。我娘知道中了他的诡计，正要迎上去说几句，林秀峰冲进屋里，冷笑一声：“老母狗，可知道我林秀峰的厉害！”我娘说：“林先生，你前几次拿的烟都没给钱，你是知道我们家的困难的……”没等我娘说完，林秀峰一棍子把我娘打倒在地，接着又是一棍子，把一个装着开水的瓦盆打翻了，一盆开水全洒在我娘的前胸。我娘被烫得在地上打滚。林秀峰举起棍子还要打，一看邻居们都来了，他才走了。邻居们把我娘抬到炕上，解开上衣一看，只见她的整个前胸，满是水泡，有的水泡破了，露出鲜红的血肉。

我爹回来看到这副惨状，流着泪气愤地说：“我们一家八口，被他们逼得死的死、扔的扔，如今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往后还不知咋样呢！……”邻居们听了爹的话，都含着眼泪。我爹的话一点儿不假，当时我们矿工的生命毫无保障，除了被鬼子、把头打死、逼死外，常常在沒有安全设备的危险条件下劳动而断送生命，我自己就遇到过一次。那是一九四四年的一天，我们刚刚爬进掌子里，只听见“轰隆”

一声巨响，大家手里的瓦斯灯全都震灭了，冒落的石块，劈头盖脑地砸下来。幸亏一位老工人把我拉到顺槽里，才算保住了性命。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鬼子投降了。一九四六年秋天，毛主席派来的工作团到了麻山煤矿，领导我们斗把头、搞生产。为了穷人的彻底翻身，不少工人跟着八路军打国民党反动派去了。那年我才十五岁，几次要求参军，可八路军的一位连长总说我个头太小，没有同意。

在开展煤矿的生产恢复工作中，尽管生产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叫过苦。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战胜了各种困难，很快地改变了麻山煤矿的落后面貌。今天的麻山煤矿，已经使用着各种现代化的机械进行生产，用手镐刨煤、用爬犁拉煤、用筐子背煤的苦难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我和我家的情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九四九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矿党委副书记。一九四七年秋天，我结了婚，现在孩子已经上学念书了。我爹今年六十二岁，身体还挺硬实。我娘虽说身体不太好，可精神很愉快。当我想起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就更加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我要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再 生 記

王 平

撫順龙凤矿第一采煤区区长刘振山同志的老家，原住在山东省临清县长屯。

从刘振山記事起，全家五口人，全靠爹爹在外卖零活、打短工度日。那年月，一个扛活卖工的农民，怎么能养活五口之家呢。没办法，姐姐十四岁就给一家姓楊的当了童养媳，不久就死了。娘領着他和妹妹成年累月靠挖野菜、討飯过日子。一九四一年，刘振山的家乡遭了灾荒，早被地主老财吸尽了血汗的农民，生活就更困难了。就在这年冬天，刘振山的妹妹和娘先后在饥寒交迫中病死了。一过年，撫順龙凤矿的把头牟金义派人招工来了。在招工的花言巧語的誘騙下，刘振山跟着父亲来到了撫順。

—

刘振山爷俩一到矿上，发现情况完全不象招工的那

样。这里，矿工們住的是大房子，吃的是橡子面窩窩头、发了霉的高粱米稀粥。这时，刘振山爷俩知道受騙了，但是，不忍受又有什么出路呢！就是有地方去，大房子被铁丝网、电网圍着，还有矿警看守着，插翅也难飞啊！

第二天一早，刘振山爹和其他被招騙来的工人一起，就被一个姓伊的把头赶下了煤洞。这时，刘振山才十四岁，不但长得矮小，而且面黄肌瘦，伊把头不要他，他就只好又去討飯了。

当时，矿工們不仅一天要干十二个小时以上的活，而且还常常挨打受罵。刘振山爹进矿后，沒請一天假，沒歇一个工，一連干了三个月，被把头东克西扣，一个錢也沒有得到。

一天，振山爹干完活回来就病了，发高烧。第二天早上，他还想起来下井干活，剛下地，两腿就直哆嗦，浑身颤抖。工友們把他扶回炕上，說：“你歇天工，別下井了！”

刘振山也安慰爹說：“爹，把头不給咱发飯票，我出去討点啥来吃。”

正在这时，看房房子的小把头孙扒皮来催班了。他看刘振山爹还没有起来，就象恶狼似的扑了过来，恶狠狠地說：“老刘头，你怎么不起来下井？”

振山爹說：“我病了，发高烧，昨晚到現在沒有吃东西，請天假，明天下井！”

孙扒皮冷笑一声，說：“沒吃东西，那怪你嘴懶，快起来，要不，別怪我姓孙的手里鞭子不留情。”

說着，胶皮鞭子在振山爹的头上晃了一下，轉身就去催别的工人下井。过了一会儿，孙扒皮轉回来了，見振山爹还躺着，就跳到炕上，抓起振山爹日久沒理的长头发，一下子給捻到地下，用脚踩着振山爹的脖子，罵道：“你他媽的，才来几天，也学会这一套了，能下也得下，不能下也得下，只要脑袋骨硬就得上班。”說着，举起鞭子朝着振山爹的头上、身上抽打，打得振山爹滿臉是血！刘振山看在眼里，心里又疼又恨。他疼爹，他恨孙扒皮。但是，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工人们都紛紛圍了过来，孙扒皮一看人多势众，才住了手。但是，振山爹还是被逼着下了煤洞子。

当时，日本鬼子为了掠夺煤炭，不管工人的死活，哪里煤多、好采，就叫工人在哪里干。結果，片帮、冒頂、透水、瓦斯爆炸等事故不断发生，多少无辜的矿工被断送了生命！

这天，当振山爹拖着沉重的脚步，搖搖晃晃地来到掌子里的时候，鬼子班长田东就逼他到冒过頂的掌子里去拉木头。振山爹不进去，田东举起鎚把就打，被逼无奈，振山爹只好进去。他剛抓住一根木头往外拉，“轰隆”一声，一块大煤坍了下来，把他的一条腿砸断了。工人们聞声赶来，把他抬到了矿山医院。

可是，那时的矿山医院不是为矿工开的。振山爹被抬进医院后，只給上了点紅药水，拿块药布裹巴裹巴，就叫工人们抬走了。

振山爹的腿被砸断后，当然不能下井干活了，可恨的把

头，不但不給治，就連一天三角錢飯票也不給了。更殘暴的是，他們看振山爹不能給他們干活，就下了毒手。

这天，刘振山剛剛出去要飯，孙扒皮就拎着皮鞭来了。他走到振山爹炕前，冷笑着說：“老刘头，我給你找了个地方，你好好去休息吧！”

“孙……”沒等振山爹說下去，孙扒皮嘴巴一咧，面孔拉得象鞋底一样长：“来人，把他架出去！”

孙扒皮話音剛落，两个狗腿子扯胳膊拽腿，把振山爹拖下炕来。振山爹知道不好，就大声喊叫着：

“我还没有死，腿好了，我还能干活哪！……”

“孩子，孩子！……你們讓我再看看孩子，我的孩子出去要飯去啦！……”

但是，孙扒皮这个人面兽性的豺狼。哪管这些，吆喝着两个狗腿子，把振山爹拖往南山去了。

刘振山討飯回来，一看爹不見了，大声地喊着：“爹！……”

一个工人含着眼泪走过来，扶着刘振山的肩膀說：“孩子，你爹被孙扒皮拖到南山去了……”

刘振山听說，心里难过得就象扎进了万把鋼刀。他一边哭，一边往南山跑。那个工人馬上招呼了几个人，也跟着赶了去。

南山，是当时龙凤矿的一个“万人坑”。刘振山和工人們看到的是，遍地橫尸，白骨如山，天上烏鴉乱叫，地上恶

狗成群，它們爭食着那些被鬼子、把头殘害死的矿工們的尸体。工人們幫刘振山赶走了恶狗，在几块大石头和一堆新土下，找到了振山爹的尸体。振山爹被活埋了！刘振山一头扑倒在爹的尸体上，大声痛哭着，……他恨透了孙扒皮，恨透了伊把头，恨透了日本鬼子……

二

刘振山的命运和他爹一样。一天，孙扒皮拎着皮鞭对刘振山說：“这里房子窄小，你得走，要不，挂号下井干活去。”

一个十几岁的孤儿，无亲无靠，能到哪里去啊！死逼无奈，刘振山下井当了小矿工，背炮药。

刘振山在柜上挂的号是五九〇〇八。所以工人們都叫他〇〇八。

有一天，刘振山正在掌子里走，忽然，“轰隆”一声，大掌子冒了頂，一下把刘振山埋到里边了。

“不好，〇〇八埋在里边了，快扒！”工人們呼喊着重，向冒頂的地方跑去。日本监工的拦挡着工人：“什么的〇〇八、〇〇八，他的死了死了的有，你們快快的干活的給。”

但工人們誰也沒听他的，仍向里面跑去。就在这时，又是“轰隆”一声，一号溜子冒的看不見頂了，刘振山的呼救声也听不見了。

“完了，〇〇八完了！”工人們叹息着，心里十分难

过。日本监工的赶过来：“○○八死了的有，統統的回去，干活的給。”說着，把工人們赶走了。

其实，刘振山並沒有死，在第一次冒頂的时候，落下来的一块板石架在煤壁上，沒有砸着他；第二次冒頂的时候，因为有板石挡着，也沒有砸着他，但他被震昏了。当他清醒过来再次呼救时，只觉眼前一片漆黑，凭着乱石煤块空隙透进来的一点空气，使他活了下来，但憋得他头昏脑脹，肚餓口渴，嗓子也喊哑了……

第二天，鬼子班长山出叫木匠邢玉祥到冒頂的掌子头去釘門子。老邢听到里边有呻吟声，知道刘振山沒有被砸死，就和几个工人一起，把他救了出来。

夏末秋初，矿上发生了一次大瘟疫。万恶的日本鬼子发现誰家有病人，就把門封死，不給治疗，也不給吃喝，把一家老小活活地病死、餓死、渴死在里边。更殘暴的是在有病人的房上倒上汽油，点上火，把人活活地燒死在里边。住在大房子的工人有了病，就送到隔离所，进行隔离，或送到炼人炉去活活地“炼”了。

刘振山生了一场病，这时剛好，面黄肌瘦，身体十分虛弱。这天，一帮日本鬼子和矿警来大房子驗便。驗出哪个工人是稀便，就在胳膊上画个記号，拉到一边，然后送隔离所隔离。一个鬼子看刘振山的臉色很难看，沒驗便，就在胳膊上画了記号，拉到一边，准备送隔离所。刘振山听人說过隔离所的情况。隔离所的周圍用铁絲网圈着，門口有崗哨看

守。一进隔离所，就等于进了坟墓。日本鬼子根本不給治病，一天两頓飯，每頓一碗稀薄稀薄的发了霉的高粱米粥，不用說病人，就是好人也得被活活餓死。“病人”天天往里送，住不下，就把病重的工人拖出去，送进炼人炉活活地給“炼”了。和刘振山同住一个大房子的小袁的爹，就是被送进炼人炉活活地燒死的！

“这地方不能去，得逃啊！”刘振山心中暗想，于是，琢磨起逃的办法来。

山坡上，长着沒膝盖高的荒草，刘振山知道，山坡下有一条下水道。他急中生智：“逃！”于是，他在难友中間慢慢往山坡边上挤，瞅鬼子一不注意，凭着他矮小的身子，一骨碌就钻进了荒草里，滾下了山坡，躲进了下水道的脏水管里。就这样，刘振山才又逃脫了这场灾难。

但是，当时，有多少矿工和矿工家屬，遭到了鬼子的毒害；也不知有多少矿工，因劳累过度，吃不飽，喝生水，吃冷飯，鬧肚子生病。可日本鬼子不分青紅皂白，說都是“虎列拉”，被关进了隔离所，送进了炼人炉啊！

三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撫順市解放了，龙凤矿門前，紅旗招展，人們个个喜笑颜开，到处奔走相告：

“毛主席的队伍来了！”

“矿工翻身了！”

刘振山走在矿工的队伍里，活跃在人群中，虽然是数九寒冬，他的心里却是热呼呼的。

不久，軍代表刘鳴同志来到了矿上，他代表党和政府，給矿工們发了粮食，并深入到矿工宿舍、住宅区，向矿工們宣傳党的方針政策，讲矿工为什么在旧社会受苦、受剝削、受压迫，讲革命的道理，启发矿工的主人翁責任感；讲恢复生产的重大意义；具体帮助矿工們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

刘振山虽然年輕，但軍代表的话，使这个在旧社会深受压迫和剝削的“奴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表示：“我一定好好干活。”

不久，矿山开始恢复生产了。刘振山就主动要求去采煤。他刻苦钻研技术，虛心向老工人学习。

一九四九年三月，人民政府逮捕了罪大恶极的封建把头牟金义，并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依法处以极刑。矿工們个个拍手称快。刘振山止不住內心的激动，他說：

“共产党是咱們的救星，她給我父亲报了仇，給千千万万死在矿山的工人报了仇。”

在党的教导、培养和同志們的帮助下，刘振山很快地成长起来了。

一九四九年，刘振山当了采煤生产組长。

一九五二年，刘振山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一九五三年，刘振山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

被提任为采煤班长。

.....

一九五五年，刘振山被評为撫順市劳动模范。

一九五六年，刘振山出席了全国煤矿系統的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議，见到了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

当刘振山見到毛主席的时候，他激动得两眼流出了热泪。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他想了許多，想到了娘和爹的死，想到自己过去是一个穷要飯的孩子、“臭煤黑子”，今天也能进北京，还见到了毛主席，……这一切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新旧社会截然不同的鮮明的对比：旧社会矿工是牛馬，新社会矿工是国家的主人。这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呀！

矿 山 血 獄

黑 龙 江 省 鹤 崗 矿 务 局 許 明 家 口 述
生 产 学 习 大 队 党 总 支 副 书 記

鹤 崗 市 文 联 “ 四 史 ” 編 写 小 組 整 理

每当我想起我被关在伪滿“鹤崗刑务署”的那段经历时，总是久久地不能平静。那段血淋淋的经历，使我永远也忘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一九四四年的冬天，我被日伪警察五花大绑地从佳木斯装上囚車，押送到“鹤崗刑务署”。这件事情发生以前，我是一个汽車司机，在佳木斯一家运输公司開車。有一天，我跑車剛回来，便被几个便衣特务抓到了警察署，他們硬說有人托我买了汽油，对我用了种种刑罰——灌凉水、吊打、“坐飞机”……后来又把我送到法院蹲了两个月，最后給我定了个“国事犯”的罪名，判了七年徒刑，押送到了“鹤崗刑务署”。这是多么大的冤枉啊！实际上我并没有給别人买汽

油，而是有一个开汽车的同行打听我哪里卖汽油，我把知道的卖汽油的地方告诉了他。就这样，我就被判为“国事犯”！

“鹤岗刑务署”就是一座特殊形式的劳工营。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鬼子用枪杆子逼牌子工（归劳务系管的矿工）下井采煤还觉不够，又在一九四二年秋天，盖起这座长宽各约半里的人间地狱——“鹤岗刑务署”。这个监狱里的难友，都是从佳木斯、牡丹江、富锦、密山、克山、勃利、四平、长春、北安、绥化、哈尔滨、延吉、依兰等地的伪监狱里转来的。他们有的是不甘心当亡国奴而被称为反满抗日的“政治犯”、“思想犯”，有的是所谓“国事犯”或“经济犯”。日本鬼子、警察就每天逼着这些难友下井去刨煤，来满足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煤炭的要求。

二

刑务署警备森严。四周用两道铁丝网、一道电网围着，电网旁有一个高高的岗楼，大门口有端着枪的警察看守着。

我被分配到一号牢房。一进牢房，就有一股又臊又臭的气味，原来日本鬼子怕难友逃跑，在每间牢房里都设有厕所。厕所旁边是两铺对面炕，炕上挤满了一百二十个难友。晚上，难友们以谷草做被褥，以砖头当枕头，挤得连身都翻不过来。走廊里响着看守警察巡夜的皮鞋声，窗外不断传来拷打难友的皮鞭声和喊叫声……在这种环境里，怎么能睡好觉呢。

早晨天刚亮，牢房外面的哨子声就象狼嚎一样地叫唤起

来。看守警察把牢門打开，用一条小铁鏈子把每两个人拦腰鎖在一起。站好队后，四周再圍上一条很粗的铁鏈子，让难友手提着它。难友們被刺刀逼着跪在挂着膏药旗和“滿洲国”旗的旗杆底下，不准抬头，誰要动弹一下，就得挨一頓枪把子。然后由一个滿臉連鬚胡子的日本警尉高田“訓話”。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啦，什么“日滿亲善，共存共荣”啦，什么为“大东亚圣战增产”啦……他說完了，我們就得上井干活了。从牢房到井口，只隔一条公路，我們还是被铁鏈子圍着，周圍都有日本鬼子和警察押送，誰抬头或稍微走慢了一点，就得挨一頓毒打。

日本鬼子和监工的无故毒打难友的事情是数不清的。我头次下井就挨了一頓毒打。监工的让我去推煤車，六百多米的巷道，坡度很陡，又沒有灯，我只好一条腿在前边趟着道，摸黑量着走。一下到井里，我就觉着憋得慌，气都喘不上来，怎能干得动活呢？我剛停下想歇一会儿，就被监工的看見了。他那一双老鼠眼一轉，把我渾身上下看了个遍，劈头就是一鎚把，打得我两眼直冒金花，两脚站不穩。我正想和他說說理，被一位难友一把拉开了。他是怕我吃亏，拉我去和他推車。

那时，我們在井下一天要干十二个小时的活，可是只給两頓飯吃。在井下吃一頓，一个人只給七个馬粪蛋那么大的橡子面团子。这哪是人吃的飯哪，咬一口，又酸又苦。听难友說，有不少人因为吃了不消化脹肚死掉了。干完活回监后

吃一頓，一人只給一碗又酸又澀的发了霉的高粱米粥，粥里帶沙子，还有耗子屎。粮食都叫日本鬼子克扣去了。根本吃不着菜，碰上給几根咸蘿卜条，就算过年了。天长日久，大伙餓得瘦成皮包骨，走道直打晃。

穿的更不用提了。听說只是第一批进監獄的难友，冬天給发了一件坎肩，一条褲子，夏天发給了一件布衫，一条褲衩。象我們后进来的，穿的都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衣服。看守警察发給我一套灰黄色的破破烂烂的“犯人”服，上衣的背后用白鉛油写着：〇〇八七四。棉褲破得只剩下半截褲腿了。这叫什么衣服啊，实际就是发了一个“犯人”号碼！在井下干这样重的活，一件破衣服能穿几天哪？难友們个个都是衣不遮体，有的圍个水泥袋子，有的披个破麻袋片子，既不能挡风，又不能遮雨。个个披头散发，光脚露胸，都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这样的苦难生活，誰受得了呀。有不少难友因为不甘心忍受这种生活，越獄逃跑。日本鬼子对逃跑的人更是狠毒了。有一天，在井上干活，有人逃跑了。警察端枪去追，乘这空，又跑了五个。头一个逃跑的难友，活活被打死了。后跑的五个人，也被抓回来，全都吊在旗杆上。过后，警察向高桥报告：“人都冻死了！”高桥反倒哈哈大笑：“中国人火大的有，死了的沒关系，有尸首的可以，跑了的不行。”

难友們一提起日本鬼子高桥，人人恨得咬牙切齿。在監獄里，他还有个“取調室”，是專門作审讯、上刑用的。“取

調室”里有上大挂、灌辣椒水、跪磚头等各式各样的酷刑。夜間經常从那里傳來慘叫声……但这声音給难友帶來的，不是恐怖和屈服，而是对敌人的仇恨！

三

在監獄里，日本鬼子、警察、犯人队长等除克扣难友們的口粮外，对难友的敲詐、勒索更是无孔不入。进監獄时，难友穿的衣服，帶的一点行李，哪怕是有一点值錢的东西，也要被他們想尽办法弄去。家里来人探監，送的一点衣物、錢……难友連影子也見不着。

我被押来的时候，脚上穿着一双新鞋，就被警察給勒索去了。那天，我正在井下装車，那个用鑊把打我的監工的向我走来。这次他忽然对我和气起来。說：“怎么样？徐哥，累不累？歇歇不要紧，有什么难处你就說。沒关系。”他这么一来，倒把我鬧糊涂了。第二天我下井后，他又来了。他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說：“掌子里沒有几个穿新鞋的，黄部长（在那里管警察得叫部长）看中你这双鞋了，想跟你換換。”說完就斜楞着眼睛看看我。这回，我明白了，原来他是要我的鞋呀！我有心想不給他，可是看他那不怀好意的样子，就忍气把鞋脫給他了。掌子头見了咧嘴一笑說：“还是徐哥够意思。”我可遭了罪，从此一直光着脚，脚冻得裂开一条条大口子，往外直淌血。脚踩在石头上，痛得直钻心。

对新来的难友，他們常常是找碴打一頓，然后把衣物搶

走。有一天，一号牢房新来个难友，下井时我见他脸上有血，知道是“犯人”队长打了他，就悄悄对他說：“是进来的人，都躲不过狗腿子的棍棒，你提防着点，今天还可能来我你的别扭。”他說：“怕什么，怎么也得死，跟他拚了！”我看他长得膀大腰圆，身上还带着孩子气，悄悄对他說：“可不能莽撞啊！”正在这时，忽然掌子里閃出一道亮光，姓盛的“犯人”队长提着一根棒子来了。这个刨子手拿灯向新来的难友臉上一照，看见他臉上沒汗，劈头盖脑就是一頓棒子。新来的难友也真挺硬，一把就将“犯人”队长手里的棒子夺过来折断了。

这下子可把“犯人”队长惹火了，还没等那位难友防备，他抄起铁鎬就把那个难友砍死了。而后，还把那位难友身上那件沾滿血迹的新衣服扒下来，拿走了。出井的时候，我看见他向日本鬼子高桥报告：“井下冒頂，砸死一个‘犯人’。”这种殘暴罪行，在难友們中間引起了极大的憤怒。

就在砍死那位难友的当天晚上，有一位姓李的难友，在三百馬机上挂了二十多輛車，等“犯人”队长从掌子里走出来，他一拔插銷，車跑到半道，鈎头上边的鋼絲繩就断了，飛車出軌，一下子就把“犯人”队长撞死了。大家心里特別高兴！可是姓李的难友在車上沒下来，也牺牲了。

四

第二年春天，日本鬼子对我们逼得更紧了，一个班出煤

从二百五十吨，增加到三百吨，每个班干活的时间也比前一年加长了。

井下安全设备很少，经常发生冒顶事故，不少难友被活活埋在里边，三天两头从井下往上拽死尸。可是日本鬼子高桥和监工的象催命鬼似地逼我们进去扒煤，不进去他们就打。难友们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就象上了捻的炸药一样，一点就炸。

快要过端午节的一天，日本鬼子高桥一个人蹒跚蹒跚，大摇大摆地下井来了。牌子工张殿义、李玉连正在那儿歇着。高桥用灯一照，看他俩都没干活，就火了：“快快的干，不干死了的有。”他俩见高桥只是一个人，就想收拾他。俩人指着没有整修好的棚子说：“危险，要冒顶！”“什么，冒顶的没有。”高桥一边说，一边拿着一个带尖的榔头敲敲顶板，扬头往上瞅着说：“你们心的统统坏啦……”话还没说完，李玉连走到高桥身后，一把夺过高桥手中的榔头，还没等高桥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听“噗味”一声，高桥的脑袋开了瓢。在旁边的难友们都围上去，还怕他躺在那儿装死，又搬来几块大煤块砸在他的头上。这一下更解恨，脑袋砸了个稀碎。怕日本鬼子下井来追查，大伙一合计，李玉连弄来了一纸筒炮药，放在棚子的梁子和刹杆的缝里，在灯盒子上接上了线，离老远一通电，那边就轰的一声，冒顶了，把高桥压得严严实实。

日本鬼子高田得信下井，把牌子工和难友都抓起来，挨

个审問，大伙异口同声地說，“井下拆棚子，高桥去看，木匠告訴他危險。他說‘危險的沒有’，站在那儿不动彈，結果冒頂砸死了。”日本鬼子查不出可疑的痕迹，只好把人都放了。高桥被砸死的消息，很快傳开了，我們听了都觉着很解恨。

高桥剛被砸死不久，矿上突然来了一营日本关东軍，据說足有五百多人，刺刀上枪，子彈上膛，把整个矿区封鎖了。不管是难友，还是牌子工，或是在附近居住的男女老幼，一律集合去按指印。后来才断說，在日本鬼子运貨的大卡車上，有人用手指写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語。这八个字象八顆炸彈似地在鬼子心中爆炸了！他們又是調兵，又是照象，又是按指印，又是化驗……象一窩馬蜂似的，鬧騰了一陣，什么也沒有查出来，就垂头丧气地走了。

五

自从发生砸死高桥和发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語以后，監獄大門增添了崗哨，牢房里增加了看守警察，在矿井四周也安上了电网，把从監獄到矿井的路，圍了个严严实实。

同时，日本鬼子把下井干活的时间又延长了，每班出煤又从三百吨增加到三百五十吨。掌子里的情况越来越坏，冒頂事故更是天天发生。

有一天，难友們正在商量今后怎么办的时候，監工的領

着日本鬼子高田来了。高田看我們都在巷道里坐着，罵了一声“八嘎牙路”，就用鎬把狠打起来。监工的更是仗势欺人，一边吆喝着：“都他媽的偷懶，还不赶快装車”，一边揮动鎬把，往掌子里擻我們。这时，掌子里沒有一点响声，頂板上也不掉渣了，有經驗的牌子工曾告訴过我們，这是要冒頂的信号，高田見我們仍不进掌子，揮动鎬把硬把我們七个人赶了进去。两車煤還沒装完，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一股气浪帶着一块巨石砸在我的脖子上，接着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难友們已經把我从煤堆里扒出来，我的嘴直冒血沫子，鼻孔直流血，脖子上有很长一条大口子，伤口的血和煤渣子混凝在一起（一直到現在脖子上还留着这条伤痕），我支撑着身子剛站起来，就又昏倒了。和我一起装車的那六个难友都被砸死了。

难友們把我从井下抬回来，沒送进牢房，直接抬到病号室。一进屋，又腥又臭，使我恶心得要吐。原来許多病号都病得不能动弹了，吃、喝、拉、撒、睡都在一間阴森森的小屋里，病号的伤口沒水洗、沒药上，皮肉都叫膿水給泡烂了……。日本鬼子对病人的迫害，更是狠毒。監獄規定病人吃粮減半，这就是說，本来少得可怜的口粮，一有病还得減去一半，那就只好活活餓死。所以，大伙都管病号室叫“等死室”。我的伤比較起来稍微輕一些，而且沒等伤口好我就要求回牢房了，这才从“等死室”里逃了出来。

刑务署这个万恶的人間地獄，到底吞噬了多少无辜的中

国劳动人民的生命，这笔血债是无法算清的。我听拉死尸的車老板告訴我：哪天都有难友被押进来，哪天都有尸体被拉出去。最初死的人少，鬼子叫两个难友往出抬。后来死的人多了，人抬不过来，就雇車专门給监狱拉死尸。車是一个特制的抽底木箱，一次能装七个死尸，一天拉三趟。越死越多，車拉不过来了，日本鬼子又盖了个“死人仓库”。难友死了把衣服扒光，一丝不挂，只在手腕子上系个木牌。牌上写着死者的编号，把死尸横七竖八地往里边一垛。后来日本鬼子看死尸太多，又用刺刀逼着七百多名难友在东坡（位于“大陆”露天坑东西山岗下）挖了三条大壕沟。每条沟約有三十米长，三米来深，两米宽，这就是“万人坑”。成車成車的死人往坑里扔。这儿的狼吃人都吃紅了眼，日夜成群結队来找食，不仅吃死人，見到活人也要吃。日本鬼子有一部分家屬住在附近。他們为了吓唬狼群，給自己壮胆子，更灭絕人性地把还没咽气的病号，扒光了衣服綁成“拿枪”和“射箭”等姿势，死后弄到东坡四周竖起来吓唬狼群。这是多么殘暴的罪行啊！每当我们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真是头发根子都立了起来，恨不得从鬼子手里夺过枪来和他們拚了。

六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中午，我們发觉牢房外边的鬼子、警察，都露出惊慌的神色，但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过了一会儿，哨子声一响，我們照常站队去矿井。井上

井下的情况也有变化。井口架上了机关枪，看样子好象要打仗。下了井，监工的乐呵呵地过来和我们说：“哥们，今天先装一排车，完了就歇着，别着急，听见铁管子响再干……”

监工的说完就走了。大伙的心象悬在半空中，一点不摸底。前几天，不知从哪里传来个消息说：日本鬼子快要完蛋了。想到这里，难友们都担心起来，怕日本鬼子下毒手把井口封死，于是，就派了几个难友悄悄溜到井口去监视敌人的行动。在井下的人，勉强装完一排车，大伙就在巷道里商量起来，想法子跑出去。

半夜十二点钟，铁管子一响，监工的来了。大伙把那一排车放出去，照样交班，监工的照样报了产量。这时，日本鬼子更是慌慌张张的了；监狱里只有几十个警察，也都溜进岗楼里去了。院子里，乱糟糟地没人管，看来日本鬼子是要完蛋了。

饭后，有的难友喊：“走，闯出去！”于是，我们直奔监狱东大门，把看守警察围住，看守警察吓的哆哆嗦嗦地说：“大门拧着疙瘩（即上锁），我开不开，……我有老婆孩子，你们要走就从别处走吧！”大伙把看守警察捆起来，撕块破布把他的嘴给堵上，然后从大门拐过来，一齐向西南角跑去。我们来到电网跟前，把十几条用水浸透了的破毯子头往电网上一扔，只见一片火花，电网破了！

“跑啊！跑啊！”人们喊着跑着，一千多名难友都冲出了“鹤岗刑务署”。天刚蒙蒙亮，我们从过路人那里得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我激动得眼泪象泉水般地涌了出来。

痛打矿警队

吕宝兴

阜新矿区学习大队編織厂党支部書記孟广善同志，原是山东章邱人，十三岁那年，被地主逼得走投无路，随着父亲到山东天子元（淄博）煤矿当了童工。在矿井里，十几岁的孩子，光着身子，拉着一百多斤重的煤爬犁，劳累一天，只能吃到点煎餅。并且在煤洞里吃，煤洞里睡，整天不見天日。日本鬼子怕工人逃走，在矿井的四周，修起高大的圍牆，圍牆上修着炮楼、架着电网，矿警队白天黑夜端着枪把守着，工人们經常遭到日本鬼子和汉奸把头的辱罵和毒打。有一次，孟广善父亲的耳朵被打聋了，孟广善气憤极了，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和伙伴们商量：“得想法逃，不能活活地等死！”于是他和父亲等十几个人藏在进矿运煤的火車上，逃了出来。

孟广善虽然逃了出来，但家中一无所有，无法为生，无

奈，父亲把九岁、十三岁的两个妹妹送给人家做童养媳，剩下的一家六口辞别了故乡，来到了阜新煤矿。

但是，天下烏鴉一般黑，脫了虎口，又进了狼窩。到了露天矿，他們被分配在七十二号大房子里。屋子里被烟熏得黑洞洞的，門窗上連一块紙片都沒有，穿堂风刮得忽忽地直响。对面两鋪通长的大炕，南炕是独身汉，北炕是带家眷的。孟广善一家六口，給了两米大的地方，炕上連一块席头都沒有。盖的是麻袋头，枕的是破磚头。冬天，在这北风刺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矿工們連棉衣、棉褲都穿不上，有的矿工穿着破水袜子，連脚指甲都冻掉了，在坑里劳累一天，回到家里，还是睡在冰凉的炕上，啃口窩窩头，想喝口热水都沒有，冻得渾身发抖，上牙磕着下牙。許多工人都冻出了病。没办法，他們就只好到矿上去拣点煤，回家生火取暖煮飯。但万恶的日本鬼子和把头連这也不让，矿警們更是仗势欺人，經常出来抓拣煤的，要是抓着了就是一頓毒打，而且还把煤拿去自己卖錢。因此，矿工們都恨之入骨。

有一天下班了，孟广善和另一个矿工老王拣了几块煤往外走，被矿警发现了，立刻把他們逮到警备队，用藍、紅色鋼笔水画了一臉，让他們扭秧歌。孟广善和老王气愤地說：“俺是山东人，不会扭秧歌！”一个矿警說：“不会扭，也得扭。”孟广善和老王还是不扭。矿警就把他們关到一間黑屋子里，并把他們打得渾身上下不成样子了，一直折磨了半宿才放出来。

全家人一看孟广善被打成这个样子，都难过地流了眼泪。他母亲说：“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孟广善愤愤地说：“非得和他们干不可……”

孟广善忍着疼痛来到了同班矿工老王家里。他把要教训矿警队的事讲了，老王很赞成。“打他狗日的！”老王一边骂一边扭身从炕底下抽出一把崭新的约有三分厚一尺来长的钢刀给孟广善看。孟广善一看就明白了，老王早就有打这帮坏蛋的准备了。孟广善是个细心的人，凡事都要做一番细致的琢磨。他对老王说：“我们要好好商量商量！”

“商量啥？豁出我这一百多斤来了，一定要和这些王八蛋拚了！”老王更加急躁地说。

“不，我们既要把他们打了，又要保全自己，不能硬拚。”孟广善仍是心平气和地向老王进行解释。

老王是个急性子，马上就问：“你说怎么办？”

孟广善说：“我看咱们最好是夜晚行事，因为夜晚狗腿子看不清楚是谁打的。”

“行！”老王点点头说。

孟广善又说：“我们要从一五〇绞车铁道南那个刺网的缺口走，因为那里一般只有三个狗腿子，我们容易对付他们。”

“好，这办法好。”老王表示很赞成。

“打完以后，敌人一定要来追，我们最好向塔子沟那边跑去，那里山多，有藏身之地。”

“妥，就这么办！”老王高兴地說。

孟广善讲完后，老王又告訴他說：“老弟，我再給你看看一个法宝！”

“什么法宝啊？”孟广善不明白地問道。老王随手拿出来一个装满了石灰的小紙袋子，走到孟广善跟前，伸手做了抓一把打出去的手势。孟广善明白了他的用意，哈哈的笑了。老王也随着哈哈大笑了一阵。

过了两天，孟广善和老王正赶上早晨三点钟下工的班。在上班的时候，老王身上扎了一根腰帶，把鋼刀和石灰袋子藏在身上，同孟广善上了工。当天，天气冷得厉害，北风吹得电线嗡嗡地响。可是，孟广善和老王两个人，虽然身上穿的很单薄，却全身热呼呼的。好不容易盼到下班了，工人们三三两两，十个八个都上了坑。孟广善和老王故意拣了些煤炭，杂在人群中間，向坑沿走去。到了坑沿，有人說：“前面有矿警！”这时，孟广善拉了拉老王，示意叫他做好准备。

坑沿上，三个矿警队员，一个扛着三八大盖枪，两个手里拿着鑿把，分別站在铁絲网的兩边，一看工人上来了，就叫：“过来！过来！”孟广善和老王，毫不畏惧地走过来，决心和狗腿子斗一斗，孟广善把煤往地下一扔，故意挑战地問：“过来干什么！”

“誰叫你拿煤？”矿警队员大声喝斥。

老王双手掬在腰上說：“你他媽的有吃有喝，不冷不冻了。我告訴你，你們別这样装腔作势！”

这时，矿警伸手就来抓他们两个。

老王扔掉煤块，便从石灰袋里掏出一把石灰，猛劲地朝这个拿枪的狗腿子打去，只听到“唰”的一声，狗腿子的眼睛被石灰烧得睁不开了，疼得他象挨杀的猪似的叫起来。老王就势一把把枪夺过来，腾的一脚，便把这个家伙打到壕沟里去了。老王端起大枪对着两个家伙说：“别动，动就打死你！”孟广善抽手打去，矿工们也拥了上来，你一拳，他一脚，把两个家伙狠狠地揍了一顿，直打得鼻青脸肿，还把一个家伙的腿打断。那个滚在沟里的狗腿子逃跑了。孟广善一看，这里离矿警队队部很近，时间长了，怕调人来，于是叫大家赶快回家，然后自己拉着老王也向着东南方向跑去。不大一会儿，果然听见从西边传来狗叫人喊的声音，手电筒的亮光一闪一闪越来越近。老王端枪就要向追来的矿警队开火。孟广善一把抓着枪栓，扯着他往孙家湾北大门小桥跑去。跑了一会儿，他想这支破枪不好掩藏，而且敌人为了找回这支枪非要穷追不可，于是，老王把枪放在道口上，两人就直奔高德驛水源井躲起来了。敌人赶到桥头北，七嘴八舌地叫嚷一阵，一看没有人，拣起枪垂头丧气地溜回去了。孟广善俩人，看看没有动静了，趁着天还没亮，就赶快地回到了家。

第二天，痛打矿警队的事件轰动了全矿。工人们都纷纷议论，大家莫不拍手称快。可是，打那以后，工人住宅区可就不安宁了。特务、便衣警察，经常到处巡风，查访那晚闹事的人。那天夜晚，他们没有看清面貌，只记得口音是山东

腔，但矿上山东人成千上万，到底是誰呢？愚蠢的敌人最后想了个笨招，遇到山东工人就用話套問。

有一天，把头詐問孟广善：“老孟，你听說那天是誰打了矿警队？”同时留神观察他的表情。孟广善不惊不慌地回答：“听說有那么回事，到底是誰打的呀，可不知道。”

.....

敌人一連調查了六七天，什么也沒得到。

一九四八年阜新解放后，矿工成了矿山的主人。孟广善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于一九四九年初，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現在孟广善家有八口人，住在工人住宅里，生活与过去完全不同了，全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有三个孩子在学校念书，改变了祖祖輩輩沒有念书的情况。

康德九年11月份

方家大柜

工 数		30	月/日	借金	物品	单价	物品	单价	上月欠金	番 号
工 賃 金 額		32	34						9.38	8127
引 去 金 類	共 济 金	1	20						本月扣金	氏 名
	舖 底 費	2	00							牛 世 清
	平 时 賃 金								27.20	入 伙 日
	炕 长 費	4	00						应領工金	11 月 1 8 日 年
	伙 食 費	7	50							出 伙 日
	飯 票	12	00						4.24	月
	水 袜 子								本月欠金	日 年
	作 业 器									把 头
	理 发 費	4	00							次
	車 牌 罰	1	50						經手人	領金人押
	安 全 灯 罰									
	石 炭 賃	1	10							
	印章指紋照象									
	餐 具									
事 务 印 刷	5	00								
菜 金	6	00								
衣 服										

着一張工票（見照片）。這張工票是一九六三年九月七日，吉林省辽源矿务局职工在“方家坟”矿工墓的一具骸骨的胸部发现的。工票是一张七寸见方的黄纸单（見上图），它用一張蜡紙包着，虽然在土里埋藏了二十多年，但字迹仍很清楚。

工票的右上角是“方家大柜”几个字。“方家大柜”是一家矿业把头的組織。这个把头的名字叫方明，他是日本帝国主义压榨中国工人的一群凶恶爪牙当中的一个。（一九四二年以前，这里还有“董家柜”、“宋家柜”、“譚家柜”等大大小小十几家柜头。）工人进了“方家柜”，就如同上了榨油机，直到鮮血吸干，骨髓吸尽，才被扔进乱尸堆。

這張工票的主人牛世清是哪省哪縣人，現在已無法查考了。從工票中他被扣去二元“鋪底費”和四角“炕長費”來看，我們可以知道他是被把头從遠地招騙來的，隻身住在大房子里。又從他被扣去的一元五角“車牌罰”來看，我們還知道他是在井下的采煤工人。工票載明：牛世清是一九四一年（偽康德八年）十一月一日來到“方家櫃”的，剛過了一年，就在重重剝削和壓榨下被折磨死了。

這張工票上“引去金額”（即扣款）欄目中一筆筆的款項究竟是些什麼呢？

“鋪底費”，就是工人被招騙來時，旅途的食、宿、車船和來到礦山時的安身等項費用。據老工人回憶：把头把工人騙來以後，就裝進“悶罐車”，一天給兩個豆腐渣窩窩頭。到了礦山，給一床用破布和棉花粘到一起的“老虎被”，還有一個草枕頭和一個水碗。這就是工票中的所謂“鋪底”。據資料記載：每從遠地招來一個工人，實際花的“鋪底費”只有十元零七角。牛世清從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被騙來礦山就開始扣款，直到發這張工票為止，整整十三個月，被扣去二十六元的“鋪底費”。如果牛世清不死，誰知道這筆“鋪底費”要扣到何年何月才算完？

“炕長費”，炕長，就是專門管制住在大房子里的工人的寄生蟲。一個大房子，長達十間，對面的通天大炕，炕長住在炕頭。工人一進大房子，從吃到穿，從說話到睡覺，都要受他的管制。每天，工人睡覺前要把衣服脫光交給他；大

小便要向他請假；連睡覺面朝哪都得由他安排。他為所欲為，看誰不順眼，就打誰的鋤頭棍，罰跪，罰打“協和嘴巴”，不給飯吃。此外，他經常想各種辦法來盤剝工人。比如，他看到新來的工人有件稍微好点的衣服，就假惺惺地說：“你看，旁人都披的麻袋片，等你下井時會把你的衣服偷去的，放到我這裡保管吧！”這樣，這件衣服就歸他了。這麼一個無惡不做的傢伙，每個工人每月還要出四角錢養活他。這就是舊社會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

“共濟金”，是工人到了礦山，從第一次領工資就開始扣的。這筆錢，說是包括給工人和家屬的醫療費、傷病津貼、吊慰金和葬祭費等補助，但這些都不過是騙人的鬼話。工人有了病，往病號房一拖，連口水都喝不上；工人被折磨死了，就扔到“方家墳”，甚至身上仅有的破衣、破鞋都被扒掉，哪裡能享受到什麼醫療、傷病、埋葬等補助！據日偽“西安礦業所”資料記載：“共濟金”每月都按上一年度的全礦職工平均每天工資的一半扣除，照當時規定，牛世清的這一項也只應扣五角左右，但這裡卻扣了一元二角。顯然，大小把頭們又從中剝削了一層。

“飯票”，也叫“實物引換券”，是盤剝工人的另一種手段。每做完一個工，就發給工人四角“飯票”，不要不行。這種“飯票”，只能到礦業所開設的店鋪里买东西。這店鋪的東西，一般比市價貴一倍到三倍。但是，貴又怎麼辦呢？礦山周圍幾道鐵絲網、電網圍着，工人出不去。就是出去

了，这种“飯票”也是廢紙一張。工人們就只能忍受这样明显的剝削！

“石炭貸”，就是工人住大房子燒炕用的煤錢。这笔錢出在工人身上，是再冤枉不过了。冬天，根本不敢把炕燒热，因为炕长睡炕头。炕头不凉不热，炕梢必然冰冷。睡着冷炕，还被扣錢！

“車牌罰”，据說，工人下井前要領車牌，刨一車煤往車上挂一块牌，如果升井后，丢了牌子，就要受罰，这就叫“車牌罰”。这种車牌子是用一块铁片子或木板子做的，它怎么能值一元五角錢呢？这实际就是敲詐勒索。

“伙食費”，老工人說，当时工人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米飯和橡子面掺玉米面的窩窩头，再加几根咸菜条，每月最多也花不了四元錢。牛世清却被扣去了七元五角。

“菜金”，这是工人过年过节时吃菜的扣款，把头也从中进行盘剝。

“理髮費”，据老工人回忆，工人两三个月才能理上一次髮。可是月月都要扣四角錢。

“事務印刷”，这是“方家柜”的办公費。这也要从工人身上出！

在这十七項扣款項目中，还有七項在这个月內沒有扣。但既立了名目，当然也会扣的。其中包括工人吃飯用的“餐具”，刨煤用的工具“作业器”，甚至画押时打“印章指紋”，都一概要工人出錢。看，日本帝国主义者、买办和封

建把头就是这样随心所欲、巧立名目来搜刮工人的钱财和血汗的！

以上是已經写在工票上的名目。据老工人回忆，还有一些名目，如一年一度給“老君爷”做生日（矿山把头欺騙和剝削工人的一种迷信活动），打預防針（照規定是免費的），买防空灯罩，等等，都經常要扣工人們的錢，不过沒有記在賬面上罢了。

工票載明，牛世清在这个月里，一天也沒有休息，做了整整三十个工，所得工資是三十二元三角四分。这个数字与他所創造的价值是怎样个比例？我們从日伪“西安矿业所”的資料中，找到这样一个材料：一九四一年，每个采煤工人每天采煤一点八八吨，每吨煤售价是二十二元六角五分。牛世清干了三十天活，价值應該是一千二百七十七元四角六分。他这月三十二元三角四分的工資仅占他这月采煤价值的百分之二点五。而这极少的一点点，他也无法得到。十項扣款扣去了二十七元二角，加上上月欠款九元三角八分，不但一个現錢沒得，还倒欠“方家柜”四元二角四分。这就是旧社会在帝国主义、买办和封建把头奴役下的一个煤矿工人卖命劳动一个月的“总收入”。

牛世清含冤飲恨死去二十多年了。但从他留下的這張工票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封建把头对矿工的殘酷剝削和压迫；帮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階級、什么是剝削和压迫，从而激发我們的階級感情，增强階級观念，提高階級觉悟，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作者:东北地区四史丛书编辑小组编
页数:74 出版日期:1965年03月第1版
主题词:家史 中国 现代